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法捷耶夫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出 版 说 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代表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的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成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苏联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文艺理论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战斗的、不平凡的一生和他的创作道路及艺术风格；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主要作品《毁灭》和《青年近卫军》。

法 捷 耶 夫

作家的生平

引　　子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是一位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不仅是有世界影响的天才作家，而且是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高尔基之后苏联文学事业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作家协会总书记、主席，同时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他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先后两次荣获列宁勋章。

法捷耶夫三十多年的创作活动是紧紧地围绕着无产阶级的伟大奋斗目标进行的。他的《毁灭》、《青年近卫军》都是苏联文学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解决了当时文学领域存在的基本问题。法捷耶夫的创作密切联系生活，具有强烈的党性，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同时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精湛纯熟的水平。

在革命的环境中诞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反对黑暗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的事件此伏彼起。法捷耶夫就是在俄国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诞生的。他生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廿四日，家住特维尔省（今加里宁州）基姆雷市。他的家庭是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法捷耶夫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了糊口，曾到处漂泊多年。他三十岁时，才通过顽强的自学、以校外考试的方式取得了教师的资格。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产生了革命的要求，所以他在乡村学校任教时，就参加了民意党人的革命活动，不久也成了民意党党员。他的一生贫困、坎坷，受过迫害、坐过牢、被流放过，一九一六年死于肺病。

一八九七年，法捷耶夫的父亲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在彼得堡坐牢时的某一天，有一位二十四岁的姑娘前来探望他；虽不认识，但却在监狱负责人面前自称是他的未婚妻。这位姑娘就是当时正在彼得堡医士学校读书的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她是受彼得堡革命者之托前来探监的。不久她真就成了他的未婚妻。在他被流放去阿尔汉格尔省申库尔斯克时，她也跟他一起去了。就这样，他们在流放地结婚了。流放期满之后，这对年轻的夫妻被生活所迫，经常辗转迁徙，由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期间，他们有了三个孩子：一九〇〇年达尼雅诞生，一九〇一年萨沙（法捷耶夫）诞生。一九〇五年弗拉基米尔诞生。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后来只靠法捷耶夫作医士的母亲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的工薪来勉强维持。他父亲认为，家庭生活妨碍他的革命活动，所以和家庭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一九〇五年后，则和家庭完全脱离了关系。当时，他们家正住在维尔诺市。也是在维尔诺时，法捷耶夫的母亲认识了市立医院的医生、社会民主组织的成员格列勃·佛拉基斯拉沃维奇·斯维德奇，并和他一起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斯维德奇常到他们家来作客，他天性善良、乐观，所以法捷耶夫和姐姐、弟弟都很喜欢他。一九〇七年，斯维德奇成了法捷耶夫的继父。家中的生活虽也清贫，但却充满了愉快、幸福的气氛。

法捷耶夫的继父斯维德奇因“政治上不可靠”被解雇后，全家搬到了乌发，一九〇八年秋又从乌发搬到海参崴。这是法捷耶夫的姨母马丽雅·弗拉基米罗夫娜建议他们搬去的。作家的父母在海参崴没有找到工作，就又搬到了偏僻的乡村。迁移了几个地方之后，一九一一年他们才在楚古耶夫卡定居下来。楚古耶夫卡是个大村镇，位于远东景色秀丽的南乌苏里边区苏昌峡谷之中，离铁路线一百二十公里。法捷耶夫的父母在这里边行医，边种地。一九一四年，法捷耶夫的继父被征入伍，做医疗工作，一九一七年在前线患斑疹伤寒逝世。

法捷耶夫的母亲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是一位思想先进的俄罗斯妇女，早在青年时代就支持革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更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斗争，如输送传单，转运武器等等。她意志坚定，性格刚强，孩子们都非常热爱她。她对孩子们的思想有很大影响，据作家的姐姐达尼雅回忆：“妈妈把全家都说服了，她使我们相信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安东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的寿命很长，死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法捷耶夫的双亲热爱劳动，也以热爱劳动的思想教育子女。法捷耶夫从

小就自己把掉下来的钮扣缝上，自己补衣服，自己铺床、叠被、洗衣服，替母亲洗餐具、擦地板，此外，还会收割和捆扎麦子、割草，码草垛，莳弄菜园子，做木匠活……

法捷耶夫的父母和后来的继父都是革命者，他们在法捷耶夫很小的时候，就给他的心灵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在他的思想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法捷耶夫的双亲都是劳动者，一直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因此法捷耶夫从小就热爱劳动、熟悉和热爱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法捷耶夫从小就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看到劳动人民备受压迫和剥削。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唤起了一种模糊的愿望——改变现存的沙皇专制制度，使劳动人民获得自由和解放。

在革命的薰陶下成长

法捷耶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远东楚古耶夫卡村度过的。他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战斗，在这里成长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他的许多美好的回忆都是和楚古耶夫卡、和远东紧密相连的。他把远东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远东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

法捷耶夫先就读在乡村小学、后来又在海参崴商业学校读书。在海参崴学习期间，他住在姨母马丽雅·弗拉基米罗夫娜家中，只是在放暑假时才回到楚古耶夫卡的家里。

法捷耶夫特别喜爱故乡那壮美的，像仙境似的大自然：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雄伟的阿穆尔（黑龙江）流域的肥沃的田野、山谷，翠绿的锡霍特—阿林山脉，高悬在海上的巍峨峭壁，耸入云天的巨松，以及那条曲曲弯弯的从故乡楚古耶夫卡经过斯巴斯克、穿过海滨茂密的大森林和湍急的河流、然后又越过山岭南通向海参崴的大道。他一回到故乡就和朋友们外出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到森林去采蘑菇和野果，到河里去捉鱼，到古堡的废墟上去凭吊。他也常干农活或家务活。法捷耶夫从小就喜欢帮助双亲干活，放假回家仍如此。这时，他最喜欢干的是割草。清晨，和朋友们蹚着露水走向芋绵芬芳的草地，晚上，常常是唱着民歌，顶着星星返回村庄。他们的歌声总是给同村人带来愉快和欢笑。假期一满，他立即回到城里去学习。

法捷耶夫每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特别是文学课的成绩更突出。他童年时代就喜欢读书，十岁时写过充满童贞幻想的感人诗歌，十一岁时模仿所读过的作品写过一篇中篇惊险小说。这个中篇，他的姐姐曾给自己的同学们朗读过。

一九一四年，法捷耶夫升入五年级。他的班主任老师是教语文的，叫巴什科夫斯基。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有敏锐、深刻而细致的洞察力，很快就注意到了法捷耶夫。他在班级工作总结中对法捷耶夫是这样写的：“这个有一张白皙的脸和剪得很短的浅亚麻色头发的孩子，非常温和，内向。他注意地聆听老师讲课，一句话也不放过。有时，他双眉紧锁，脸色严峻起来。他的前一桌坐着涅列佐夫和鲍罗德金。后者顽皮好闹，常对法捷耶夫作鬼脸，竭力想把法捷耶夫逗笑，但是这孩子耸动着眉头间的皱纹，向他投去责备的目光。他穿的立领黑上衣不完全合身：不是裁缝匠做的，很显然是家做的。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穿得比别人差而感到尴尬，表现得不卑不亢。”巴什科夫斯基对法捷耶夫及其同学的外表和内心描写得很生动。他发现了法捷耶夫的写作才能后，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积极的帮助。在巴什科夫斯基的指导下，法捷耶夫经常组织文学晚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和朗诵自己喜欢的诗人的诗篇。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能背诵大段大段的散文作品。他的作文总是得到最高分数。

法捷耶夫对文学和文学创作的爱好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巴什科夫斯基的影响下培养起来的。他对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一直铭刻在心。一九五五年，他在给巴什科夫斯基寄去的一本书上的题词中还对老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而对法捷耶夫影响最大的还是西比尔采夫一家，也就是姨母家。作家回忆说：“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在这个家庭中所受的教育远远超过在自己家里所得到的。”

法捷耶夫的姨母马丽雅·弗拉基米罗夫娜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她和丈

夫米哈依尔·雅科夫列维奇·西比尔采夫都是优秀的人民教师，很有学问，很有教养。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从布尔什维克党在远东地区开展地下活动开始，她家就是其活动中心之一。海参崴的先进青年常在这里聚会，或讨论革命问题，或读革命书籍，或吟诵渴望自由的诗篇。法捷耶夫的两位表兄都是坚强的共产党员，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

大表兄弗谢沃洛德·西比尔采夫在彼得堡工学院读书时，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一六年他到了世界大战前线，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一九一八年他回到了远东。这时已经是一位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和成熟为布尔什维克宣传家了。他担任过海参崴卫戍部队的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二〇年五月，他和远东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拉佐等一起被日本武装干涉者俘获后扔到火车头的锅炉里活活烧死了。他为革命就这样英勇牺牲了。一九一八年以前，法捷耶夫和大表兄很少见面，因为大表兄很少回家来；一九一八年以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法捷耶夫每次耳闻目睹到大表兄的革命事迹，都使他受到很好的教育。

二表兄伊戈尔·西比尔采夫是法捷耶夫的知心朋友，他们形影不离地在一起度过了六个春秋。他比法捷耶夫大三岁，作为兄长，对法捷耶夫非常关怀、爱护，而法捷耶夫对二表兄则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处处照他学。伊戈尔勤奋学习，读书很多，法捷耶夫也不甘逊色；伊戈尔培养自己的英勇性格，锻炼自己克服任何困难的能力，法捷耶夫在钦佩他的同时也这样做。伊戈尔善于团结人，他周围总是有很多同学，他的生活离不开友谊，离不开集体。法捷耶夫把二表兄身上这些优秀的品质不仅学来了，而且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和斗争中发扬光大了。就法捷耶夫爱好体育这一点来说，也是在当时驰名海参崴的体育健儿伊戈尔的带动下培养起来的。一九一六年伊戈尔考入彼得堡工学院。入学不久就被征入伍，然后被派到伊尔库茨克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九一八年春，伊戈尔回到海参崴后，被选为布尔仆维克党地下市委委员，接着又被选为地区党委委员。担任过人民革命军参谋长，部队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当白匪军冲到他跟前大叫：“他就是红色的政治委员”时，西比尔采夫开枪打死了一个军官，又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

西比尔采夫一家人的革命思想、革命品质和文化教养潜移默化地陶冶着法捷耶夫的心灵。他就是在西比尔采夫家这个革命环境、革命气氛中成长起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革命的熔炉中冶炼

法捷耶夫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参加工人红十字会的工作开始的。工人红十字会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组织。一九一八年六月在海参崴发生反革命叛乱后，当白匪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乌云笼罩远东的时候，转入地下的共产党组织主要是通过工人红十字会进行革命活动。而法捷耶夫就是在这个时候，以亚历山大·布雷加的化名积极地参加了工人红十字会工作。他给狱中的同志送药品、衣物和食品，跑交通，造假证件和护照，张贴革命传单，藏匿和转移从狱中逃出来的革命者，并把假证件或护照交给他们。有一次他在大白天把布尔什维克的传单贴在了市中心的敌军司令部大门上。他在执行党的任务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勇敢、机智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赞佩，党组织对他也特别信任。

由于法捷耶夫的工作出色，革命立场坚定，所以海参崴布尔什维克地下市委讨论法捷耶夫入党时全体市委委员一致同意他入党。当告诉他市委接受他为党员的时候，他那双平素总是淡灰色的眼睛霎时变成了黑色的——每逢他特别喜悦、激动的时候，都是如此。就这样，法捷耶夫立即成为正式党员，没有预备期，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他还没满十七岁。一九一九年春，红军在东方战线开始反攻。游击运动在远东白军的后方蓬勃地开展起来。针对红军的反攻，高尔察克宣布了总动员。共产党远东边疆区委员会则发出号召：不给高尔察克当兵！大家都来为反对高尔察克、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进步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纷纷走向原始森林去参加游击队。当时必须持有海参崴警备司令签字的证件才能到达游击区。而这样的证件只有被反动当局认为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得到。所以，到游击区去的人大多数是带的布尔什维克仿制的假证件。但是，法捷耶夫进入游击区使用的却是真证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法捷耶夫从入商业学校起，就和同班同学、林务官的儿子任尼亚交上了朋友，关系很密切。任尼亚的父亲在靠近当时的游击区有一座庄园。任尼亚刚参加完毕业考试（法捷耶夫只参加了一门功课的考试），要到庄园去休息一下，顺便打打猎。法捷耶夫知道后提出要到他的庄园去作客，任尼亚高兴地同意了。他们二人很顺利地从警备区司令部领到了通行证。他到了庄园后，自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带着枪，去湖上打猎。当走到湖边时，法捷耶夫把枪交还给任尼亚，说：“对不起，任 尼亚，我骗了你。我要去参加游击队，我们的人都已经去了。”任尼亚的睑色刹那间全变了，眼睛里流着泪水。他好像同情法捷耶夫，理解法捷耶夫的行为是高尚的，但他只能得过且过，不能跟法捷耶夫同去。这时，法捷耶夫还真怕他说：“我跟你走。”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吻吻法捷耶夫。他们告别后，法捷耶夫就愉快地迈开大步向游击区走去。

法捷耶夫循着森林间踏出来的荒僻小径，来到苏昌游击区，在游击队里当普通战士。入伍不久，法捷耶夫就面临考验。他参加了游击队清算任尼亚父亲的庄园的斗争。这个庄园的仓库里有许多粮食、马厩里和畜栏里有许多马、牛、猪。游击队司令部下令要征用这些东西。法捷耶夫几个月前在这个庄园里受到了任尼亚的款待，并且是任尼亚把他带出海参崴的，而现在却要没收他家的财产，这事有点棘手。可是法捷耶夫一点也没感到良心上受到责备。主人已经不在庄园，但是任尼亚家的女佣人和长工都认出了他，向他求情，想通过他来保全他们主人的财产。法捷耶夫不但没答应，反而对他们长

篇大论地进行了一番革命法制的教育。

一九一九年秋，他和二表兄被编入共产主义特别支队。这支主要是活动在敌后的游击队，在国内战争时期，在远东起过巨大的作用。支队的战士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它的指挥员是政治上成熟的，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彼伏兹涅尔。法捷耶夫后来说过：《毁灭》中游击队长莱奋生的形象在许多方面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塑造出来的。

在游击队里法捷耶夫是个文武双全的战士。他总是挺身而出去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作战勇敢，侦察机智。此外，在战斗间隙，他还积极地写传单，起草各种文件，经常在《游击队通讯》上发表文章和向居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如解释十月革命、共产党口号和苏维埃政府法令的意义等等。

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夜间，日本干涉军狡猾地撕毁了刚签订不久的停火协议，向游击队发动了突然袭击。游击队司令部命令共产生义特别支队掩护大部队撤退。在这场血战中法捷耶夫（这时已是支队政委之一）的大腿负了重伤。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把他从前沿阵地抬下来。法捷耶夫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时候，就和二表兄一起领导了用《无产者》号轮船在乌苏里江上运输军用物资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因为它要在离日本武装干涉军占领的伯力很近的地方执行，还因为船上常有掉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很严重的战士，他们随时想夺取轮船逃跑。

后来，法捷耶夫又在人民革命军的队伍里作战，担任过团政委、旅政委。一九二一年二月被赤塔布尔什维克军人代表会议选为出席全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于三月到达莫斯科。

第十次党代会于三月八日在克里姆林宫开幕。这一天，法捷耶夫看见了列宁，谛听了他的演说。几乎是和代表大会举行的同时，白匪军在喀琅斯塔得要塞发动了叛乱，妄图获得外援，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三月十八日，法捷耶夫和其他代表一起参加了伏罗希洛夫指挥的镇压反革命叛乱的战斗；在攻到敌人堡垒附近的壕沟旁边时，法捷耶夫腿部受伤，倒在芬兰湾的坚冰上，几个小时之后才被发现。因为流血过多，伤势很重，他住进了彼得格勒医院，疗养了整整一个春天和半个夏天，九月才回到莫斯科。伤愈之后，他复员了。一九二二年法捷耶夫进了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同时兼作学院的党委书记和莫斯科路德维奇·斯密斯工厂的党委书记。

在革命熔炉的熊熊烈火中，法捷耶夫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者，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斗争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作用。

创作道路上的头两步

在沸腾的革命斗争岁月里，通过血与火的斗争实践，法捷耶夫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他熟悉党的地下工作的全部秘密情况，熟悉游击队的全部活动情况。他始终跟白匪军和外国武装干涉军战斗；他住过泥房和帐篷，也在野外露宿过；他侦察过敌情，经常出没于城镇和山林之间；他挨过饿，受过冻，负过伤，体验过胜利和失败的感情；他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的题材，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说过：“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诞生应当归功于那个时代”，“我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是作家，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了。毫无疑问，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创作会成为革命的创作。”

根据法捷耶夫自己说，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一九二一年。他在列宁格勒住院养伤的时候，就构思过关于内战题材的大作品。他后来写的《毁灭》和《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的主题同他关于内战题材的构思有关。如果考虑到法捷耶夫在远东时发表在《游击队通讯》上的文章和特写，我们还可以把作家开始文学活动的时期提早两年。不过，法捷耶夫作为作家出现却是在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三年五月，法捷耶夫把他第一篇小说《泛滥》的手稿寄到了《青年近卫军》杂志社。同年夏季的一天，他来到了杂志编辑部。据当时接待他的编辑、作家李别进斯基回忆说：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走进屋内，头戴一顶便帽，身穿一件硬邦邦的长大衣，蓝莹莹的眼睛里闪耀着坚毅的目光。他自我介绍说，姓法捷耶夫，是矿业学院购学生，到这里来是想了解一下编辑部对《泛滥》的处理意见。李别进斯基说，小说准备发表，对小说还附带称赞了几句。法捷耶夫听了后，非常自持，对李别进斯基的夸奖很有分寸地表示了谢意。李别进斯基同法捷耶夫第一次见面就很喜欢他，并邀请他参加以《青年近卫军》杂志为中心的文学青年组织。法捷耶夫同意了。

中篇小说《泛滥》的故事发生在远东苏维埃政权创建的时期，主人公是布尔什维克聂烈京。他把农村的贫农组织起来同富农、大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最后他在贫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大会上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作者极力把他写成一个无私的、勇敢的、高尚的具有新道德的、有理想的人。他完全献身于改造现实生活的伟大事业中，他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

这篇小说中自然风光、个别人物与情节写得很成功，但整个说来艺术上是不成熟的。法捷耶夫后来自己说：“这部作品的结构是松弛的，意思是模糊的，语言是恶劣的”，是一篇“不严肃的和粗糙的”作品。

半年以后，法捷耶夫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小说《逆流》。后来，作者将这篇作品加以改写，更名为《阿姆贡团的诞生》。小说描写的是内战时期远东地区一个团队改编的故事。

这个中篇较之《泛滥》无论是主题思想、情节结构或人物描写等方面都向前跨了一大步。团政委契尔诺科夫、战线政委索布尔、护航队长薛烈兹涅夫——这些布尔仆维克的形象比聂烈京的形象生动得多，而且更富于艺术性和说服力。这些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逆资产阶级思想潮流而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法捷耶夫这两篇早期作品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是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却是

个起点，特别是其中显露出了法捷耶夫创作上的最重要的特点——竭力要阐明共产党在组织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并尝试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这同当时那些对游击队的自发景象作绘声绘色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或用革命的最终目标来为无政府状态辩护的作品是大相径庭的。

“纪念碑的小说”

一九二四年，法捷耶夫还没结束学业，就被调离矿业学院，去作党的工作。先在克拉斯诺达尔任地区党委书记，后到罗斯托夫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出版部主任，同时编辑边疆区机关报《苏维埃南方报》，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这段期间，他一方面领导边疆区工农通讯员的活动，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哥萨克村镇居民、顿巴斯矿工以及迈科普采油工人，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思想、生活、劳动和风俗习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另一方面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作演讲，阐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积极宣传、贯彻和执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锻炼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了综合材料、使用材料和提炼主题的本领。这期间，他也积极地探索了苏维埃文学如何反映新时代、塑造新人形象的途径，努力学习古典文学大师的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这些都促使他在创作上迅速地成熟起来，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小说《毁灭》。

《毁灭》这部书是法捷耶夫在一九二五年开始写作的。当时的苏联正在进行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一九二五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工业化的纲领。然而工业化计划的实施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苏联文学的发展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私人出版社重新活跃起来。出版了很多黄色的翻译小说和一些模仿它们的国产品，出版了诸如《狗胡同》（作者是古米列夫斯基，内容是描述青年男女之间非常庸俗的爱情关系）之类的一些书籍。在不少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作家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如形式主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特别重视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问题。在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议中就指出要为工农兵创作出思想性强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了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要尽一切努力发展讽刺文艺。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俄共（布）中央在《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指出：“必须把主要力量用于创作新的艺术珍品，新的苏维埃的作品。苏联文学的任务在于表现新人、苏维埃时代的人物、正面人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根据共产党的要求，根据时代的需要写出来的。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只描写了一九一九年夏天和秋天活动在远东的一支以矿工为核心的小小游击队，在队长莱奋生的领导下同追击他们的白匪军和日本干涉军周旋。他们虽然忍受着种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克服了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战斗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最后只有十九个人突破了包围，但他们仍满怀必胜的信心去迎接新的战斗。

小说的情节虽然很简单，只写了一支游击队的命运，并且是只从与游击队人员有关的不广阔的角度来描写的，但是作者却以高度的艺术才能表现了整个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赋予了小说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真实的现实生活图景，刻画了像莱奇生、莫罗兹卡、巴克拉诺夫、麦杰里察像这样一些永不磨灭的新人的光辉形象，从而使《毁灭》成了苏联文学中能代表一个历史阶段的作品之一，是“纪念碑的小说”（鲁迅语）。

长篇小说《毁灭》也有缺点，这就是作者虽然正确地反映了党的领导，但没有谈到党组织本身的活动情况，再一点是对历史环境的描写不够，游击队员们没有谈到政治，甚至没有提到过列宁。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

但是，这并没有减低这部小说的意义。它表明了苏联文学是在矛盾中发展起来的，并非一帆风顺；它也说明苏联文学并不是一下子就写出了生活的全貌，解决了全部问题的。法捷耶夫通过他的作品《毁灭》，在揭示新一代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胜利，单只这一点，对于苏联文学的发展和塑造苏维埃现实生活中新人物的形象方面，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毁灭》在苏联早已成为众所推崇、声誉卓著的一部文学作品了。苏联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文学课程一直在讲授着这部小说。《毁灭》的全书或片断被翻译成五十四种苏联少数民族的文字和二十多种外国文字。《毁灭》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在国外也颇有影响，例如，荷兰作家托依恩·特弗立兹说，《毁灭》和其他苏联文学作品“唤醒了西欧整个年轻的一代诗人和小说家，其中也有我”。

毛泽东同志对《毁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在一九四二年说过。“……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维埃史诗的诞生

法捷耶夫在北高加索工作期间，常到莫斯科来。他有一些远东的和北高加索的老朋友、老同志在莫斯科的高等学校学习。他一来就去看望他们，特别是赶上他们中的某一个结婚、生日或生小孩时，必去祝贺一番，参加喜宴，愉快异常。他喜欢充当临时歌唱队的指挥，用他的一双长手臂指挥别人，以他嘹亮的歌声领唱。他的脸朝着歌唱队，带有一种诚恳的、亲切的表情，显示出他急切地想使每一个人都唱得合拍。如果有人突然发出了尖厉的声音或唱走了调，他便挥挥手，笑起来。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完《毁灭》后，被调到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工作。一到莫斯科，法捷耶夫便埋头创作。他先是想写反映北高加索生活变化的长篇《省城》，但是青年时代在远东生活的印象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于是他放弃原来的打算，开始写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他的工作特别紧张，往往一连几天通宵达旦地伏案书写。他住在郊区苏科尔尼基。这里有一片森林，在一些上百年的松林中间，会突然遇到一块长着雏菊或铃兰的美丽的草地，夜幕降临时，花草上常沾满晶莹的露珠。法捷耶夫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来观赏这美丽的自然风光，感到心旷神怡，赏心悦目，把疲劳、甚至把烟雾沉沉、喧嚣熙攘的莫斯科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这部长篇，法捷耶夫从来到莫斯科就写，一直写到逝世，也没有写完。作者原计划写六部和一个尾声，但只写成了四部。由于这几部书发表的时间（从 1929 年起）断断续续，而且最终未能完成，所以给评价这部作品带来一定的困难。从已发表的几部来看，故事发生在苏联远东的滨海地区。时间是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和夏天，大约比《毁灭》里面发生的事件早两个月。书中主要描写南乌苏里边区人民群众的游击战争。这场战争的打击对象是白匪军、外国干涉军，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军队。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一九一九年春天，在远东的游击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滨海州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马尔杰米扬诺夫和谢辽沙到各村于和游牧民族居留地去进行全州起义者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乌兑格人沙尔。沙尔和马尔杰米扬诺夫早就认识，因为后者从前逃难时曾在乌兑格人的部落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次他们分手时，约定在乌兑格人的村庄银子崖谷见面。马尔杰米扬诺夫和谢辽沙来到了驻在奥尔加的格拉德基赫游击队司令部。队长格拉德基赫和政委谢尼亚·库德洛维奇不在。参谋长克林金看了马尔杰米扬诺夫的委任书后，面带笑容作了自我介绍，接着给他看了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尔科夫拍来的六封电报，内容是催这个游击队赶紧去苏昌。走出司令部，马尔杰米扬诺夫在奥尔加电报局同苏尔科夫互通了电报。从苏尔科夫那里了解到：苏昌矿山上聚集了日本军队；在施柯托伏附近游击队与日美干涉军发生了战斗，州党委代表楚尔金已经来了将近一个月，苏尔科夫同他发生了意见分歧；最后，让马尔杰米扬诺夫转告谢辽沙，说他姐姐列娜从海参崴回到了家里。谢辽沙听说姐姐回来了，高兴得跳了起来。由这开始，作者用倒叙的手法介绍了列娜回来的经过。

列娜和谢辽沙的父亲是斯柯别叶夫卡村的医生，现革命委员会委员，姓柯斯杰涅茨基；他们的母亲和大资本家金梅尔的妻子是亲姐妹，临死前留下遗嘱：要把列娜送到海参崴的金梅尔姨母家去受教育。

列娜九岁到了金梅尔家，她在这个资产阶级家庭中长大成人。她目睹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切肮脏和丑恶的生活。经过一段痛苦的追求真理的过程，她决心摆脱这个家庭，回到已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和弟弟身边。在回家的途中她遇见了地下党州委的代表楚尔金，他们同乘富农卡尚诺克的马车回到了故乡——州革委会所在地斯柯别叶夫卡。苏尔科夫就住在列娜家里，和她家里人同桌吃饭。

马尔杰米扬诺夫和游击队长格拉德基赫，政委谢尼亚见面后，知道游击队第二天就开往苏昌，当即决定随他们一起走。

翌日拂晓，队伍就出发了。一个叫施巴克的战士用洪亮的声音唱起了《德兰士瓦》这支歌，整个队伍和走在队外的马尔杰米扬诺夫、谢辽沙也随着唱起来。在西大沟峡谷他们和队伍分了手，按照约定地点，两个人往银子崖谷的方向走去，在快到乌兑格人的村庄时，遇见了前来迎接的沙尔和基孟卡。他们在村里和乌兑格人一起欢度了玛法熊节，看到了乌兑格人的原始生活方式和迷信落后的风俗，住了两天之后，又返回了斯柯别叶夫卡。谢辽沙和姐姐列娜会面了。

和列娜同车到达的楚尔金走进苏尔科夫的办公室时，正赶上他和美军代表谈判。楚尔金和苏尔科夫是老同志、老朋友，一见面就拥抱，高兴极了。美军代表走后，苏尔科夫问：“你是来干什么的？”楚尔金回答说：“来驾你的。”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意见分歧。苏尔科夫认为革命形势已发展到非举行全州起义不可的时候了，而楚尔金不同意他组织全州起义的计划，认为是冒险。两个人各讲各的理，争论不休，都认为自己对。楚尔金星和苏尔科夫的意见不一致，但在讨论攻打苏昌的军事会议上没有表态。楚尔金知道在战斗过程中，不可能有双重领导。在做出攻打的决定后，他也积极地参加了战斗，他拒绝了请他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的要求。高尔察克的苏昌卫戍司令是列娜原来的未婚夫郎高伏依。战斗打响了，非常激烈。在战斗中新情况不断发生，形势不断变化。这时楚尔金不由自主地来帮助苏尔科夫处理各种问题，成了苏尔科夫最亲密的助手。苏尔科夫受了重伤，但仍坚持指挥，直到从马上跌下来。进攻战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功。游击队撤退了。在撤退的路上，楚尔金一直为苏尔科夫的生命担忧。此外，据他个人的看法，整个军事行动是失败的。这证明了游击队不适于大兵团作战，进而证明苏尔科夫的整个军事计划是错误的。可是大多数游击队员的看法同他不一样，他们都把这次矿山之役看作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理由是把外围的敌人赶进矿山并包围了矿山，使敌人胆战心惊地过了几个小时，敌方的损失要比游击队的损失严重得多；最后是，在这次战役中游击队和日本军队初次交锋就把日本人打跑了。

受伤的苏尔科夫躺在列娜父亲—一柯斯杰涅茨基医生家里。他和做护士工作的列娜接近起来，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但他们之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互相理解，所以这种爱情关系很难得到发展。

苏尔科夫治伤期间，楚尔金承担了全部领导工作，人们有事都来找他，他什么事都得管。他懂得，如果他不过问这些，那就会贬低了自己和自己此刻所代表的那个政权的威信。这样，他也就无暇考虑他所做的事情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符合或是违背他自己原来的主张的。

有一天晚上，楚尔金和苏尔科夫又争论起来。楚尔金说苏尔科夫在矿山受挫是他的策略性错误；苏尔科夫则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如果楚尔金不同意

他的意见，他怎么会有些事还照着他说的去做……争论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坚持真理，捍卫党的事业，甚至为此都宁肯牺牲两人多年的友谊。正在这时，被关在监狱里的州党委的老领导来了信，把他们争论的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他们二人从信中都发现自己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而楚尔金错的地方多些。但是，正是楚尔金读完信后第一个打破沉默，说：“是啊，说得真叫人心服”。他们的意见一致了。

为了对高尔察克的后方进行最有力的打击，使他占领的城市、港口和铁路得不到煤，苏昌矿工举行了罢工。州革委会派谢尼亚和谢辽沙去那里做领导工作。白匪军请来了日本武装干涉军前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谢尼亚决定立即把工人从矿山调到游击队里去。苏尔科夫和楚尔金的来信也是这样指示的。几天工夫，大批工人都充实到各游击队里去了。小说就写到这里。情节往下还如何发展？从作者的写作计划里，我们大致知道：他打算详细描写乌兑格人马先达和沙尔的生活，描写乌兑格人的命运。他计划描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人开拓远东、移民者如何侵略尚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的情况，以及后者为自身的独立所作的斗争。之后，作者打算描述沙尔在和红胡子的战斗中牺牲的故事。他的妻子死里逃生，救出了他们的儿子。这个孩子是乌兑格族的最后一个战士，他将在幸福的环境里长大，并且立志改造自己民族的生活状况。

列娜同苏尔科夫和解是不可能的，她还打算帮助被游击队俘虏的郎高伏依逃走。对她钟情的谢尼亚劝阻了她，实际上是救了她。最后她把自己的命运和谢尼亚结合在一起了。马尔杰米扬诺夫和马先达后来都牺牲了。故事尾声的内容是：高尔察克政权的倾覆；游击队进城。

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描写了十月革命前期和内战时期远东地区的阶级斗争现实，热情地歌颂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卓越的历史功绩。就其主题情节之复杂、布局之庞大、人物之众多、哲理性之强烈，反映历史情况之深广度来说，可以把法捷耶夫这部线索繁多的多声部作品看作是丰富的历史“全景文学”，是新型的史诗。之所以说它是史诗，是因为它叙述了人类社会从旧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经历和复杂的过程。小说还把一些历史事件和对人类意识进行最深刻的改造问题汇合在一起，它包含有各种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以及关于把读者从昨天和今天带到美好的明天的种种问题。这样一篇史诗的诞生，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无疑对巩固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信念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有益的。

《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与《毁灭》相比，前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重加广泛，表明作者的浪漫主义因素明显地增多了，在艺术手法和修辞用语上也显得更加成熟和丰富了。

这部史诗也有缺点，主要是倒叙的事过多，有些线索机械地同各种主题结合在一起，容易给人以混乱的感觉。

歌颂新人、歌颂青春的乐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从此，苏联开始了艰苦的卫国战争。

在战争的头几年法捷耶夫和其他一些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爱伦堡等一起是以政治家、特写作家和特邀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卫国战争的。他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十多篇从前线寄来的特写和通讯中以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激情歌颂了苏军战士的英雄行为。揭露、控诉了德国法西斯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他到过西方战线、也到过加里宁战线，曾两次飞越前线来到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第一次住了三个月，第二次住了一个半月。在列宁格勒期间，他发表过广播讲话，到各区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演说，鼓舞人们树立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夺取最后胜利的信；他深入到工人、知识分子、战士和水兵中间，同他们倾心地畅谈生活与战斗，共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列宁格勒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的英雄业绩都反映在他的特写集《封锁期间的列宁格勒》一书中。特写集描写了前线的战斗和后方的劳动，描写了苏联人民顽强不屈的性格和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

在苏联人民反法西斯侵略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法捷耶夫所获得的种种印象，体验到的种种感受，积累起来的种种素材——优美的、崇高的、悲惨的、可怕的、震撼人心的许多战斗画卷都在他的著名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中如实地反映出来了。

《青年近卫军》的题材基础是克拉斯诺顿青年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活动的历史事实。一九四二年七月德寇占领了克拉斯诺顿。不久，城里出现了“青年近卫军”。这支地下青年战斗队伍勇敢机智地打击敌人，使侵略者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最先报道青年近卫军消息的是克拉斯诺顿的苏军师团报纸《祖国的儿子》，接着州报《伏罗希洛夫格勒真理报》刊登了较为准确详细的报道。这样，青年近卫军组织的功绩就传遍了苏联各地，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共青团中央迅速派了一个调查组前去了解详情。经过将近半年的调查、了解，整理出三大卷材料，其中有证人的笔录、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日记和笔记，大量的照片，采访青年近卫军亲属们和克拉斯诺顿居民的记录，还有被苏联司法机关捉到的德国秘密警察机关的侦察员和俄奸的口供记录。根据这些材料，苏联政府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发布命令，授予青年近卫军的五名总部委员——奥列格·柯舍沃伊、伊凡·捷姆奴霍夫、邬丽亚·葛洛莫娃、谢尔盖·邱列宁、刘波芙·谢夫卓娃以“苏联英雄”称号，授予其他四十四名队员红旗勋章和卫国战争勋章。苏联共青团中央想让全世界都知道青年近卫军的英雄事迹，于是建议法捷耶夫写一部以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为内容的小说。法捷耶夫以高度的责任感承担了这一光荣任务。他不满足于共青团中央调查组已搜集到的材料，又亲自去克拉斯诺顿。在那里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走访了英雄们的亲属和活着的青年近卫军队员们，并研究了当时这座英雄城市的全面情况。根据这些素材，再加上他早年在远东作地下工作时和在北高加索工作时的生活，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写，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钟脱稿，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在《共青团真理报》上连载结束，五

月国家文学出版社以《小说报》形式出版单行本，六月二十七日《青年近卫军》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批评这部小说“忽略掉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教育作用。”法捷耶夫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开始修改作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真理报》就此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经过创造性的改写之后，好书变得更好了。这部作品，特别是对青年来说，加强了长篇小说应具有的教育意义。亚·法捷耶夫虚心地接受了党的批评。党的批评的鼓舞力量帮助作家把他的优秀作品提到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法捷耶夫第二枚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文学艺术发展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青年近卫军》的确是一部成功之作。它受到了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仅从初版问世的一九四六年起到一九四九年的四年时间里，作者就收到了一万八千多封赞扬信；修改本发表后，至今已经发行了一百五十多版。这部小说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克拉斯诺顿青年的英雄事迹充满了感人的力量和崇高的精神，使读者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受到了教育和感染，而且也因为作者以精湛的艺术技巧概括了，并大大加深了青年近卫军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所进行的地下斗争的意义。法捷耶夫用他的小说把千千万万的苏联人民同这些青年的英雄功绩联系起来，并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苏联人民那种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教育出来的青年一代的心灵美。

如果在《毁灭》里作家要描写的是，一代新人怎样在内战的炮火中成长起来，怎样克服自身在旧社会沾染的不良嗜好和习惯，那么在《青年近卫军》里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则没有莫罗兹卡和其他人背负着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如果在《毁灭》里，法捷耶夫梦想的“新的、美好的、坚强的、善良的人”，那么在《青年近卫军》里，曾使作家激动过的这个梦想则已经实现。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们都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美丽的内心世界的英雄人物。在敌人占领他们家园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创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他们无限热爱祖国，无比仇恨法西斯强盗。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英武不屈，视死如归，充满了胜利信心。他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多么崇高！法捷耶夫成功地塑造了青年英雄们的群像，热情地讴歌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青年近卫军》是歌颂苏联人民壮丽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史诗，是歌颂新人、歌颂青春的乐章，是誉满文苑的不朽之作，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部作品是法捷耶夫创作中的高峰。

这部小说也有某些缺点，如个别人物形象刻画得不够完美等。

创作外的活动

法捷耶夫不仅是作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进行创作的同时，还队事繁忙的社会活动。他是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他要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会议和率代表团出国访问。

作为作家、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的领导人，他一贯关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倾向。在担任“拉普”的领导职务时，他曾积极地参加了当时（1926—1932）文艺战线上的论战和斗争。

“拉普”的全称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学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出身的作家或工农通讯员。许多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摩维奇、富曼诺夫、肖洛霍夫、李别进斯基，苏尔科夫、潘非洛夫、阿非诺盖诺夫、考涅楚克等都是“拉普”的成员。早期的“拉普”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中是积极的、坚决的，曾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地位，坚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文艺路线，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过相当良好的作用。但是，后来也犯了许多错误，主要是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这个组织曾企图使整个苏联文学服从“拉普”的利益。“拉普”的错误导致了党与非党作家的对立，阻碍了苏联文学的正常发展。

法捷耶夫是“拉普”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因此，“拉普”的错误也自然地在法捷耶夫的身上表现出来。例如，他也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同起来，把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应地等同起来，提出过“打倒席勒！”的错误口号。然而，他在完全否定浪漫主义的同时，却又大力提倡和宣传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幻想”，而他的作品《毁灭》中就有浪漫主义因素。这概念上的混乱和方法论上的错误证明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在理论上还不成熟。

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决定取消各种文学团体，组成统一的作家协会。“拉普”解散后，法捷耶夫加入了新成立的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的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副主席。一九三四年九月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又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一九三八年他被选为协会的负责书记，一九四五年九月当选为作协总书记，一九五三年十月当选为作协理事会主席，一九五四年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作协主席团和理事会。

在这些年里，法捷耶夫不仅作为作家、作协的领导人，而且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演说（这些文章和演说都被他收集在《三十年间》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共产党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因此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而无产阶级作家则应该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捍卫党性原则的战士。他主张为了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加强文艺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当是有原则的，是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出发的批评。因此，必须对一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凡是反动的、非党性的倾向或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必须坚决铲除；凡是对社会、对人民、对文艺有益的东西必须坚决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法捷耶夫注意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如

果说，在青年时代他曾对浪漫主义持否定态度，那么后来，他不仅完全克服了这一点，甚至还强调了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作用，认为生活的真实可以用“浪漫主义的、神话的或者假设的形式来表现”。但这必须与现实紧密结合，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反映出生活中新与旧的斗争，反映出新战胜旧的过程。因此，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肯定新的社会的现实，肯定新的主人公的现实主义”，同时又是“最有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法捷耶夫认为作家应当熟悉生活、应当与现代生活步调一致，作一个名符其实的现代人；应当站在当代先进思想的高度上去写作；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永远在一起。法捷耶夫不仅对当代文学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过有价值的论点，而且对古典作家和作品也有过精辟的见解。他一贯主张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

一生的为人

法捷耶夫之所以能写出革命的、优秀的作品是同他具有革命的、优秀的品质分不开的。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革命的环境中、革命的队伍里培养起了革命的道德观和革命的世界观。凡是了解他的人，接触过他的人都称他是一位好同志、好朋友，是一位正直的人、真正的人，他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忠于人民，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

法捷耶夫一向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富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不愿听赞扬的话，如有一次听到称赞他的早期作品的话后，很生气地说：那是不象样子的作品。当他听到批评的话时，则认真考虑，接受其合理的意见，如修改《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青年近卫军》。他讲真理、不讲面子的思想早在内战时期就已表现出来。他刚参加游击队不久，有一天正和表兄西比尔采夫坐在山涧旁边谈话，从对面走过来一位袖子上缝着红十字的青年。他问表兄：

“这是谁？”

“这是我们的助理医生马尔琴科。”

“啊，”法捷耶夫说：“死神的助手。”

马尔琴科听了感到很委屈。他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着，可偏偏有人跟他开这么一个过火的玩笑。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皱了皱眉头，抿了抿嘴，就走开了。

法捷耶夫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过了头，伤了马尔琴科的感情，于是晚上找到了他，向他赔礼道歉。通过交谈，加深了了解，两人后来成了好朋友。他知错就改的思想作风也充分表现在他最早检讨了在“拉普”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法捷耶夫是个酷爱学习、忘我工作的人。一九五三年年初，他有病住了院。当时正在莫斯科的郭沫若同志前去探望他，一进病房就看见：床上是书，桌子上也是书，屋里的一些地方纵横摆了不少书，简直不像病房，倒像书房；他在病中还坚持写作，修改润色作品。为了抓紧时间写好《黑色冶金》，他正患肝病仍坚持到一座钢铁厂去体验生活，结果使肝病加重了。一九四九年他率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来北京参加我国开国大典。由于频繁的活动，休息不好，得了病，但仍坚持出席会议；在健康尚未恢复，便离开北京去罗马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革命工作，他把自己完全置之度外。

他对自己不怎么关心，可是对同志、对朋友却满怀无限深情。只要他知道朋友、同志中有人遇到困难、不幸，他就千方百计地在物资上、精神上给予支持和援助。他在远东的一位老同志，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一切，病了很久，经济上很拮据。他得知后，通过另一位老同志给她寄去了许多钱和物品。法捷耶夫说：“我十分希望帮助她，但是我不知怎么做才不致伤她的自尊心。”类似这样的事和帮助老朋友、老同志治病、寻找工作的事是不少的。

法捷耶夫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得非常严格。他对文章的每一个句子、每一段内容都精心推敲，以达到精益求精的效果。他的每部长篇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甚至重写，特别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写了好几十次，可是每次都没成功”；“我在这个长篇（《毁灭》）

上花了很多工夫，个别的几章改写了无数次，有几章我改写了二十次以上……在这个长篇里没有一章改写的次数是少于四五次的。”“我为这部小说（《青年近卫军》）花了很多的心血。”

法捷耶夫的事业心很强，责任心也强，工作异常勤奋，工作效率也异常的高。就以战后十多年的时间来说，他除了创作长篇小说和繁忙的国内外社会活动外，还从事文学评论和编辑工作，以及文学顾问（不只是几十个文学家、而是几百个文学家的顾问）的工作。如果把他在这十多年间所发表的关于文学问题的报告、演说和论文搜集在一起，编成书，是完全可以和一个职业文学评论家在相同时间内的劳动总和相媲美的。如果把他在这十多年间认真阅读的几百位文学家的书和手稿之后，写给他们的信、评价、意见搜集起来，编成书，其劳动量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只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全部劳动总和。如果把每个苏联作家抽屉里的法捷耶夫在作家协会工作时所写的东西收集起来，也可以编成一本大书。他每天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自觉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相当可观的。

法捷耶夫热爱自己的文学创作工作，并抓紧一切可资利用的时间进行写作。但是，他更爱无产阶级的整个事业、特别是文学事业，他为此作出了牺牲。他修改完《青年近卫军》后，按他一般的写作速度，是可以把《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写完的，这也是他的强烈愿望。但是其他工作、特别是文学组织工作和看别人稿子的工作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以致他的夙愿未遂，就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因酒精中毒，在精神抑郁中自杀身亡。

他为什么精神抑郁？为什么要自杀？没有可靠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

法捷耶夫逝世后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地公墓。在墓前树起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法捷耶夫
1901——1956

主要代表作品

《毁灭》

《毁灭》的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是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单行本出版于一九二七年，而作者构思这部作品却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开始了。

《毁灭》虽然是一部描写游击队题材的作品，但作者的注意力并不是集中在游击斗争的外部事件上，而是集中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七月的一天，传令兵莫罗兹卡正在院子里晒燕麦，队长莱奋生走来，把一份公文交给他，叫他送到沙尔狄巴的游击队去。莫罗兹卡不愿意去送，因为他想晒完燕麦后，到森林中的医院去会妻子瓦丽亚。于是，莱奇生把公文往自己衣袋里一揣，态度坚决地说：

“去把枪交还给军需主任。交了枪，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我这里不需要捣蛋鬼……”

“叫我离队，绝对办不到，把枪支出去——那更不行。我们来干革命，可不是为了你那双漂亮的眼睛，我的朋友莱奋生！”莫罗兹卡把公文要过来往怀里一塞，骑上马就走了。

莫罗兹卡来到沙尔狄巴游击队驻地的附近时，听到了炮弹的炸裂声和机枪的嗒嗒声……他攀到山顶一看：日本人在进攻，沙尔狄巴的人在逃跑，在后边那一小堆人里，有一个瘦弱的小伙子倒下去了。莫罗兹卡见此情形，奋不顾身地冒着枪林弹雨，急驰到受伤人的跟前，把他救起来，返回了游击队。

伤员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从他的证件上知道他叫密契克。给他简单地包扎了伤口后，连夜送往医院。

密契克苏醒时，已经是白天了。他躺在树荫下的一张床上，右边站着女护士瓦丽亚，左边站着医生、院长斯塔欣斯基。他们给他处置了伤口，又给他洗了脸。

密契克是三个星期以前，满怀着幻想，吹着城里流行的快乐小调，来参加革命的。在他的想象中，游击队员都穿着仿佛用硝烟和英勇事迹制成的服装。但是，他看到的活生生的真正的游击队员，却一点也不像他想象中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很脏，虱子很多，态度粗鲁生硬，瓦偷对方的子弹，为了一点小事就破口大骂，甚至为了一块脂油也会打得头破血流。特别是，他们动不动就取笑他——笑他城里式样的大衣，笑他说话文绉绉的，笑他不会擦枪，甚至笑他一顿吃不下一磅面包。当密契克重温这一切时，他开始惋惜当初他参加游击队时所怀的那种天真美好又真诚的感情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莫罗兹卡从在医院的妻子那里回来，快到驻地时，在村主席李亚别兹的瓜田旁边勒马停了下来。他环顾四周，一看没人，就跳下马来，解开布袋，一边在田垄里爬着，一边往布袋里塞瓜，有的就掰开当场吃掉。突然，瓜田主人来了，莫罗兹卡丢下袋子，慌忙上马而去。

偷瓜的事发生后，为了教育莫罗兹卡，也为了教育全体游击队员，以挽回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莱奋生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讨论如何处理莫罗兹卡。经过大家的批评，特别是矿工排长杜鲍夫的批评，莫罗兹卡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做了诚恳的检讨，保证今后再不惹是生非。他说：“我宁愿为每个兄弟献出自己的鲜血，也决不再给

矿工丢脸。”

莱奋生的游击队在这个森林中的村落里已经休整四个多星期了。这期间，他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和从农民那里听到的情况，判断出“事情不妙”，必须赶快转移，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他虽然打定了这个主意，但是还没有转移，——他害怕轻举妄动。正在他犹豫不决时，传令兵飞马送来一封紧急专函。专函说，游击队主力遭到日军突然袭击，伤亡很重。关于打败仗的传说以令人惊慌的速度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但是莱奋生仍照常平静沉着地跟人们交谈，带着嘲弄的神情眯着蓝眼睛和副手巴克拉诺夫开玩笑。有一次一个叫“黄雀”的战士由于恐惧，大着胆子来问他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莱奋生很客气地在他额头上弹了一下，回答说：“鸟儿的头脑管不了这种事。”

收到专函后的第五天，莱奋生的交通员卡农尼柯夫从城里回来了，向他汇报说，城里完全垮台了，并从衣袖里掏出了两封信，交给他；一封是妻子的，一封是上级的。他把妻子的信放进口袋里，急忙把上级的信拆开，信中指示说：“……目前对游击队指挥部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务必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存一些哪怕是人数不多、然而是坚强的、纪律性强的战斗单位，为了将来以它们为核心……”。尽一切力量“保存战斗单位”——莱奋生的决心下定后，马上把副队长巴克拉诺夫和军需主任找来，说：队伍很快就离开这里，命令他们作好一切准备。傍晚时，莱奋生召开了有各排排长参加的队委会。在会上，他宣布了早就考虑好的部队转移的决定，请大家讨论。各排排长意见不一，第一排排长杜鲍夫完全意莱奋生的决定。杜鲍夫是苏昌矿工，他所领导的矿工排是整个游击队的主力，体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主导作用。坚决反对撤退的是第二排排长库勃拉克。他是本地克雷洛夫卡人，农民出身。他所领导的排也是由农民组成的。他不愿撤退是他关心自己的出地，而不是革命事业的利益。他的意见首先遭到了第三排排长麦杰里察的反驳。麦杰里察是牧人，他胸怀宽广，有崇高的理想，肯于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和勇于自我牺牲。他不但同意撤退，并且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撤退计划。这计划受到了莱奋生和巴克拉诺夫的钦佩和赞赏。最后，一致通过的撤离决议，就是参照了他的方案。散会后，莱奋生给上级和医院各写一封信，说部队将在日内转移。他工作完毕，已是深夜，这时才拆开妻子的来信。读后，知道家中生活非常困苦，妻子仍找不到工作，孩子们患了坏血症和贫血症，靠“工人红十字会”的救济过活。信里充满了对他的无限关怀。莱奋生沉思着摸摸胡子，动手写回信。一开始他并不愿意谈起同他生活有关的感情，但是渐渐地他写得出了神，他的脸色变得温和起来，两张信纸都被他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难以辨认的小字，而且谁也想不到其中有许多话是出自莱奋生之口。

写完之后，他走到院子里去活动一下麻木了的四肢，看见值夜人正抱着步枪睡觉。这使他联想到：“要是哨兵们也在这么睡觉可怎么办？”他强克制住自己也想去睡觉的愿望，牵出了马。这时，值夜人也没有醒。“唉，这狗养的！”莱奋生把他的帽子藏起来后，上马查岗去了。哨兵没有睡。在路上他碰见了奥索庚游击队来给他送信的通讯兵，说他们因顶不住敌人的进攻要撤退到朝鲜人的村子去。为了弄清情况，莱奋生跟通讯兵一起到了奥索庚的游击队。通过和奥索庚本人谈话，证实他作出趁早离开、隐蔽起来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天色差不多大亮了，他才回到队里。他的脸消瘦了，两眼通红，脑袋昏昏沉沉。坐下后，他立即派人把写好的信送出去。

给医院院长斯塔欣斯基的信是莫罗兹卡送去的。莫罗兹卡把信交到后，来看妻子瓦丽亚。他见妻子对他冷淡，就猜到她爱上了密契克。他感到这是莫大的耻辱，于是便和她吵了起来，又把密契克痛骂了一顿。

在归途中，莫罗兹卡的怒气逐渐平息。他走到渡口时，看到这里的秩序非常混乱：车乌行人都争先恐后地要上船，摆渡的人嗓子都喊哑了，可是没人听。原来是有人散布谣言，说日本人马上就要到啦。要是以前，他碰上这种场面，依他那好开玩笑的老脾气一定会把大伙好好吓唬一番，可是现在不知什么原因，他竟跳下马来，一面辟谣，安定人心，一面亲自指挥摆渡，维持渡口秩序。老乡们都来围住他，——他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个很重要的大人物，同时为自己这个不平常的脚色，甚至为自己压制了要“吓唬人”的愿望而感到高兴。他开始自觉地同自己身上的旧思想影响进行斗争了。

莫罗兹卡回到司令部后要求莱奋生解除他传令兵的职务，让他回到排里和弟兄们在一起。莱奋生同意了。杜鲍夫和战士们见他回来都很高兴，临睡前，派他去值夜，以“庆祝他回到季摩非（杜鲍夫）的怀抱”。夜里，他听到了远处的一声枪响，赶紧跑到杜鲍夫床前喊道：“快起来，对岸在打枪！……”杜鲍夫全副武装跑到院子里时，一看排里大多数人还没有回来：他们傍晚就出去喝酒玩乐去了。传令兵已来过两次，命令立即集合，但人还是不齐。杜鲍夫急得在院子里乱跑，他觉得自己失职，感到自己的排把全世界矿工，至少到第七代矿工的脸都给丢尽了。当他率领全排来到司令部前面的广场时，才弄清楚，根本没有什么敌人，是莱奋生要检查一下部队的战备情况。尽管如此，杜鲍夫仍为自己没能成为全队的榜样而感到痛心。

等各排整好队，点完了名，莱奋生发现库勃拉克排的情况更糟，开小差的多，库勃拉克本人白天到亲戚家里去辞行，喝多了酒，紧急集合时仍醉醺醺的。全队的人都看到他醉了，唯有莱奋生装做没发觉，否则的话，就得把他撤职，但眼下又没有人来代替他。

莱奋生骑马检查了队伍后，回到队伍正当中，严厉地说：“同志们，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目前不必说。”他批评说，紧急集合的情况很糟，纪律性很差，“要真是日本人来了，会把我们统统掐死的，像掐死小鸡那样！真丢脸！”他讲完，在马蹬上挺身直立，将马鞭一挥，下令道：“立正！齐步走！”

队伍翻山越岭，晓行夜宿。有一天，在一个山麓下的小村驻下了。密契克伤愈出院，和皮卡一起来到这里和部队相遇。莱奋生问密契克一些话后，决定把“老废物”这匹马给他骑。他和皮卡都被编到库勃拉克排。密契克一看见“老废物”，心里就顿时充满了一股无处发泄的憎恨。他认为，他们一开始就贬低他，故意给他这匹马，连一匹好马都不能托付给他。“不，我要去找莱奋生，对他说我不愿意骑这样的马……不，我要把话都跟他讲个明白，叫他别以为……”

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生着一堆篝火，约有二十来个人躺在篝火周围，莱奋生盘着腿坐着。密契克走过去，站在后面——没有人回头看他。为活跃一下紧张、沉郁的气氛和调节一下疲劳，游击队员正在轮流讲淫亵的小故事。莱奋生始终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声笑着，别人叫他讲，他也讲了几个，而且讲得最淫猥，最引人入胜，毫不忸怩。密契克也很感兴趣，跃跃欲试，但想到这种故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就装出一副不屑一听的姿态。其实，他骨子里是爱听这一类东西的。他没有加入，也没跟莱奋生谈话，就怀着对自己的

不满和对大伙、特别是莱奋生的怨恨，走开了。

在这个偏僻的小村里，莱奋生跟其他游击队几乎失去了联系。得到的一鳞半爪的消息都是令人沮丧的。他通过原始森林中多年不见人迹的、依稀可辨的小径，和铁路挂上了钩，获悉要有一列敌人的载运军火和被服的火车通过。莱奋生明白，部队迟早会被发现，没有弹药和寒衣是没法过冬的。因此，他决定作第一次出击，结果成功了，无一人伤亡。当天他就把物资分散了，除了备用马匹能够驮得动的，剩下的东西——军大衣、军刀、弹药、面包干都发给大伙。

整个乌拉辛斯克盆地一直到乌苏里都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稳扎稳打，缓慢地向前移动，派出的侦察兵不止一次地跟莱奋生的巡逻们遭遇过。莱奋生的侦察兵回来时，报告的消息往往是自相矛盾。原来这些侦察兵在离敌人十俄里的地方就不再前进的，呆在灌木林里挨到适当的时候返回来，把听到的谣传，胡诌一通报告给莱奋生。

“只好请你亲自去一趟”，莱奋生对巴克拉诺夫说。“要不然，我们呆在这儿会像苍蝇一样被人拍死。你带一个人去，天不亮就动身”。

为了考验一下密契克，巴克拉诺夫把他带去了。他们二人边走边谈。巴克拉诺夫关心他的政治思想，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的马，并下了马，亲自动手给他重新备马、弄鞍、系肚带。密契克从谈话中确信巴克拉诺夫确实比他强得多，聪明得多，是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人，而且对他毫无成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他对巴克拉诺夫心悦诚服了，甘愿永远听他指挥。他们沿途碰到的一些侦察兵照样扯谎，巴克拉诺夫听了直摇头。

在离索洛缅纳雅村还有三俄里的一个田庄里，他们把马留下，步行前往。他们在村中和四名荷枪的日本步兵相撞。巴克拉诺夫大叫一声，非常迅速地拔出手枪，两枪打死两个，第三颗子弹打偏了。剩下的日本兵，有一个拔腿就逃，另一个举起了步枪要射击，就在这时密契克为一股新的、比恐惧更能控制他的力量所支配，连开几枪，将日本人打倒。村中立即吹起了至少五把警号。巴克拉诺夫带着得意的神情喊道：“他们……　全部……都在这儿！……是主力！……过了一会，他笑了：“真是妙极了！是吗？他们进村子，我们也冲了进去。老弟，你真行！”他们边跑边说，跑到田庄骑上自己的马，返回了部队。

一向有远见的莱奋生不等他们回来就派库勃拉克排到村旁去加强岗哨。密契克走到这里时，留了下来。

他虽然十分劳累，却没有睡意。密契克仰卧着，望着隐隐透射出星光的夜空，感到心里非常空虚，他想到重伤员弗罗洛夫；当突然想到自己的命运也许会和他一样时，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可是当想到瓦丽亚时，又立刻觉得舒服起来。

日本兵进攻了。大炮轰的一响，整个山谷里都充满了回声。有几个人吓得趴在地上，密契克也像碰伤了似的，缩做一团。接着机枪响起来，紧密的枪声也随着四起，可是游击队没有还击。日本兵差不多到了跟前。密契克觉得，现在要逃也来不及了，这时，游击队开火了。密契克跟着大伙打一阵枪后，一齐跑走了。即使在这十分惊慌危机的瞬间，他也能感到这一切行动都不是偶然的和没有意义的，而是有人指挥的。究竟是谁在支配他的命运呢？不由得用眼睛搜寻着，他看见走在前面的是莱奋生。走进森林以后，他的心神才完全安定下来。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一个幽谷里隐蔽下来。尽管莱奋生疲倦得厉害，还是照例检查马匹。他一看见密契克的“老废物”，就知道它的脊梁磨破了。他生气地批评了密契克，叫他暂骑驮马。

接连几天工夫，部队一直顺着乌拉辛斯克河支流东奔西跑。由于缺粮，在战斗和行军时，整个部队人困马乏。这一带没有被敌人占领的村子越来越少了。不论面包或燕麦，不经过战斗的手段，是一点都弄不到了。伤员的伤口由于缺医少药正在化脓。人们变得沉默寡言、冷酷、严峻，凶狠起来。

在这极端艰苦的日子里，莱奋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游击队员的革命本能，正是凭着这个本能，他们才会为了最终的目的去忍受一切，甚至去死。但是，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游击队员对他所寄予的殷切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他们意志、利益的代表和对他们应负的责任。所以，他一方面从游击队员身上汲取鼓舞的力量，一方面想着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关心他们的冷暖饥饱，他要和他们患难与共。莱奋生亲自率领他们战斗，跟他们吃一锅饭，为了查岗，他夜里不睡，而且是唯一没有忘记嬉笑的人。尽管如此，他的话也逐渐有些失灵。有一天，用炸药炸完鱼（他们常这样炸鱼，捞上来当饭吃）后，他叫一个小伙子下水里去捉，但小伙子不肯下去。这时，莱奋生就握着毛瑟枪，眼睛牢牢地盯着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朝他走过去。小伙子吓慌了，紧忙脱衣服。他虽感到自己成了凌驾于部队之上的暴君，但他深信：为了维护部队的纪律，他的暴力是应当的。

从此，莱奋生就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去搞粮食，挤出时间让大家多休息。他偷牛、掠夺农民的田地和菜园，但是连莫罗兹卡都认为，这和他偷瓜完全是两码事。部队在越过乌杰庚斯克支脉的长途跋涉中，完全靠葡萄和蒸得半生不熟的蘑菇充饥。在走到一座孤零零的朝鲜农舍时，莱奋生不顾朝鲜老人的恳求，硬着心肠下令杀了他的猪；他虽然可怜老人，但他的一百五十名游击队员正张着嘴等吃的，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只好如此。

敌人的骑兵紧追不舍。莱奋生的部队边战边退。某一天的晌午，游击队踏上了去医院的熟悉的小径。他们到达时，医院院长斯塔欣斯基和瓦丽亚等出来迎接并高兴地跟大家握手。

瓦丽亚只顾寻找密契克，大伙向她打招呼，她只是敷衍作答。密契克和她相遇时，只是点点头，红着脸，把头低下，他怕她跑过来，暴露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她很有分寸，并没有因为看到他而露出高兴的样子。

密契克把“老废物”拴好后，悄悄地溜进密林深处，躺在灌木丛下，提心吊胆地打起瞌睡来。忽然，他好像被谁推了一下似地醒了；从灌木丛后传过来两个人的谈话声，他听出了是莱奋生和斯塔欣斯基。莱奋生说：

“……在这个地区再守下去是不行了。唯一的出路是往北，到土陀-瓦卡谷地里去。从这儿可以越过山 岭，再沿黄泥河子走下去。路很远，可是没办法……”

“那末，弗罗洛夫呢？”

他们二人都知道，弗罗洛夫的伤特别重，是没有救了。

“是啊——弗罗洛夫……”莱奋生痛苦地说：“看来只剩下一个办法……”莱奋生说不下去，狠狠地咬紧牙齿，不作声了。

他们二人颤抖着，苦恼着，彼此心照不宣，但又不敢一语道破。

“他们要害死他……”密契克明白之后，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脸色发白。他把脸埋在手掌里，不知趴了多久。后来，他站起身，蹒跚地向病房走去。

正当斯塔欣斯基把一种药水倒进量杯时，密契克走了进来，喊道：“您在干什么？……我都听见了！……”

“滚！……”斯塔欣斯基颤抖了一下，手哆嗦着，用喑哑的低语凶狠地说：“我宰了你！”密契克尖叫了一声，魂不附体地跑了出去，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忽然他撞到了瓦丽亚身上。

“我正在找你呢……”她喜形于色地说，但一看到他精神错乱的样子，就吓得住了嘴。

“你听我说……他们把他毒死了……弗罗洛夫……”他一把抓住她的手，毫不连贯地说。

“什么？毒死了？……住嘴！……”她突然恍然大悟，叫起来。“……你不用管……我们往这边走。”

“到哪里去？……唉，你放手！”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挣脱了她的手，把她推开。

她又拉住他的衣袖，拖着他，执著地重复说：“你不用管……我们离开这里……人家会看见我们的……我们赶快走吧！……”

密契克几乎要打她，才又一次挣脱了。

黎明时分埋葬了弗罗洛夫，队伍又出发了。部队顺着陡峭的山脊往上走，山上的青草已经被山羊啃过。头顶上是一片冷冷的、青灰色的穹苍。下面远远地隐现着蔚蓝色的幽谷，脚底下常有沉甸甸的卵石带着响声滚下去。

瓦丽亚和斯塔欣斯基等医务人员被编在库勃拉克排，他们几乎走在排尾。可是瓦丽亚一直感到密契克是在她的背后。她心里被他昨天那番不近人情的举动惹起的恼怒还没有平息，盖过了她经常对他特有的那种热烈的情意。

部队要到下面的一个峡谷里过夜。人马都在潮湿的、令人惴惴不安的黑暗中摸索。

霎时间，峡谷底部突然毫无声响地升起一片篝火的红光，使黑暗中毛茸茸的马头和疲倦的人脸上，都映着子弹带和步枪的寒光。

满山沟里到处都是同样的篝火；大家都围着篝火，一边抽烟，一边唱歌。

行军的第五天是往下走，向黄泥河子的源头走去。他们走的是冬天的道路，遍地铺着软绵绵的枯叶。现在尽管谁的手里都没有粮食了，可是大伙都情绪昂扬，因为他们觉得，可以住宿和休息的地方不远了。

莫罗兹卡和爆破手冈恰连柯并马走着。前者对后者说：

“我不喜欢农民。我小时候常到我爷爷家里去。我的两个叔叔都是种地的。他们天生是另外一种人，又刁钻又小气。其实他们穷得啥都没有。”他说着，还带着天真的、仿佛是局外人的惋惜意味笑起来。

冈恰连柯听着，灰色的眼睛里表露出聪明坚定的神色，这是那些既善于听取别人的话，更善于考虑别人的话的那种人所常有的神态。

“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比方说我啦，你啦，杜鲍夫啦，挖下去的话，都有个农民，一定有的。”他很有把握地说。

“你这是在说什么？”走在前边的杜鲍夫回过头来问道。

“我们是在说农民。我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农民。”

“是吗？”杜鲍夫表示怀疑。

“可不是，像莫罗兹卡就有个爷爷在乡下，还有叔叔。”

“我可什么人都没有，而且幸亏没有！老实说，我是不喜欢这种人的。”

“你把老百姓说成这样可不行啊！”冈恰连柯毫不气馁地说。“好吧，就算你在乡下什么人也没有，可问题不在这里”。接着，爆破手用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每个人身上都有农民。“现在我们拿城市来说，我们的城市多不多呢？扳着指头数都数得过来。可是接连几千里啊，都是一片农村。我倒要请问，这有没有影响啊？”

“有影响……当然……”杜鲍夫迟疑地说，一边在思索，这里面有没有使矿工丢脸的地方。

“说得真有道理！”莫罗兹卡钦佩地说。“你被他驳倒了，老头！”

“我这么说，”冈恰连柯解释道：“是因为不应该瞧不起农民，我们也……”他不再往下说了。

“真是个机灵鬼，”莫罗兹卡的心里对冈恰连柯越发充满敬意，认为他懂得多，看得清，不夸夸其谈，不是个二流子。他那青筋暴露的大手干起活来永不嫌多，乍看似乎动作缓慢，实际上却很麻利——它们的每个动作都是准确而有道理的。

莫罗兹卡和阿恰连柯早就成了朋友，由于天天和他接近，行军总是并马而行，渐渐地莫罗兹卡以为自己也成了一个严肃认真的游击队员了。莫罗兹卡的马养得很好，马具修补得很出色，步枪擦得像镜子一样发亮，在战斗中表现得最勇敢，最可靠，因此博得了同伴们的敬爱。他无形中也过起冈恰连柯似乎一向过着的那种健康的、有理想的生活了，在这样的生活里不容许胡思乱想。……

莱奋生因为不知道黄泥河子下游的敌人是否已经撤退，所以决定在原始森林里过夜。他一方面派麦杰里察去侦察敌情，一方面令库勃拉克派好岗哨和巡逻队。

一路上，莱奋生肋部的无法忍受的疼痛在日益加剧。但他以巨大的革命毅力克制着。他使自己相信，这是他一向都有的小毛病，根本算不了什么，决不妨碍他去完成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完成的那件工作。

像近来常有的那样，莱奋生夜里突然醒来。他点上一支烟，走出去查哨。他悄悄地在尚未熄灭的篝火中间穿过，极力避免踩在熟睡的人们的大衣上。他看见一个值班人蹲在篝火旁，眼睛睁得很大，脸上流露着善良的微笑，便放轻了脚步，怕把他脸上的微笑惊走。他走到泉水旁边时，从黑暗中传来一个发抖的声音：“谁？……那边是谁？”莱奋生听出是密契克，并不答话，径直向他走去。枪栓响了一下，可是子弹卡住了，发出可怜的轧轧声。听得出，密契克两手焦急地拼命要把子弹推进枪膛。

“应该常擦油，”莱奋生嘲弄地说。

“啊，原来是您？……”密契克如释重负地说。“我是常常擦的……”他见莱奋生走到跟前，便把心一横，决定和莱奋生坦率地谈谈。他对队长说，他在这里没有用处，不如打发他走，反倒好些；要求派他去给上级送报告，以达到他早就产生的“尽快离开部队”的可耻目的；他以正人君子的架式攻击诬蔑游击队员都是愚蠢冷酷而又毫无政治头脑的人；他美化自己无论对什么人都是一片真诚，但遇到的永远是粗暴、嘲笑、挖苦。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至于莱奋生会有什么看法，他已经毫不在乎了。

针对他的思想，莱奋生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和教育：“你说得完全不对！”接着就向他解释他为什么是不对的。但是莱奋生越解释也就越明白，他是在白费唇舌。“唉，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你只好怨你自己吧。可是现在你

没有地方可去。真糊涂。人家会把你杀掉完事。你还是好好地想一想吧，特别是我说的那些话。主要的是，决不要以为同志们不如自己……”最后，莱奋生叫密契克把枪栓关上，可见在他们谈话时，他一直都惦念着那拉开的枪栓。

“这是个头号糊涂蛋”，莱奋生一边往回走，一边想道。这次谈话使他有些激动。他在想，密契克归根到底是个软弱而懒惰的窝囊废；国内还在生出许多这样精神贫乏的废料，确实是可悲的。

莱奋生所以激动，因为他所思考的一切，乃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深刻意义和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克服这种贫困和懒惰。他渴望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但是，只要千千万万的人还被迫过着原始的，可怜的，穷困得无法想象的生活，美好的一代新人又从何谈起呢？

“难道我以前也是类似他这样的人吗？”他回忆自己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生活道路和参加革命后的成长过程。他肯定自己和密契克不一样：“我毕竟是个坚强的青年，我要比他坚强得多。我不但希望做许多事，而且也能做许多事，——主要问题就在这里。……”这时，他感到有一股异常的力量，将他举到一个不可攀及的高度，他就是站在这个高瞻远瞩的，然而又不脱离尘世和人类的高度上，来控制着本身的病痛和他的孱弱的身体。

等莱奋生回到营地时，篝火已经熄灭。巴克拉夫裹着大衣在火旁酣睡。他添了些枯草和枯枝，把火吹旺。巴克拉诺夫感到暖意，在睡梦中翻起身来，还咂了咂嘴。“瞧你，”莱奋生爱怜地想着，不禁微笑了；在和密契克谈话之后，看到巴克拉诺夫似乎使他特别愉快。

麦杰里察这时还没有回来。莱奋生派他去黄泥河子村侦察时嘱咐他务必于当夜赶回来。他不知道麦杰里察已不幸被捕，此时被打得半死，正关在一个黑魆魆的大仓库里。

麦杰里察苏醒过来时，首先感到的就是地上这股潮湿的，砭骨的寒气。他立刻想起了自己的遭遇。他的脑袋被打得还在轰轰响，头发和血凝在一块，额头上和面颊上都有血疤。

他头脑里产生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就是——能不能逃走。他寻遍整个仓库，摸遍所有的小窟窿，甚至试图把门撬开，——但都是白费劲！直到他终于认清了自己已处在绝境，明白这次他确实是无法逃脱了，才肯罢休。他一旦死了逃跑这条心后，立刻就把自己的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他把整个身心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素来专以骁勇大胆著称的麦杰里察，怎样才能向那批将要杀害他的人们显示，他对他们毫无畏惧，而且鄙视他们。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好，就被两个带枪的哥萨克带到敌军官们面前。麦杰里察微动着黑缎子似的眉毛，带着嘲弄的神气，默默地盯着他们，他的神态表示出不管他们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不管他们怎样逼他回答，他决不会说出半句使敌人满意的话。忽然，他灵机一动——何不趁此机会扑过去，抓住那个审问他的家伙，掐死他？这个念头非常强烈地控制着他，他朝前迈了一步，两手发抖，脸上顿时冒出了汗珠。

“啊！”那人惊愕地大叫一声，从皮套里抽出手枪。麦杰里察控制住自己，转身对着窗口，轻蔑地沉默着，僵立不动，对讯问的人连看也不看一眼。

麦杰里察是个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同敌人拼一死活。他在聚集着好些老百姓，四周都被哥萨克骑兵团团围住的教堂广场上，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他那矫健柔韧的身躯忽然从台阶上如

飞而下，骑兵连长被猛力一撞，跌倒了。麦杰里察将整个身子压在敌人身上，几乎就在掐住他的喉咙的同一刹那，他连挨了几枪。

麦杰里察牺牲半小时后，敌人的骑兵连便顺着麦杰里察昨夜走过的那条路疾驰着。莱奋生的游击队快走到林边时，发现有五十来名敌人的骑兵走了过来。莱奋生布置好阵势后，摆动着手枪，站在散兵线的前面。敌骑兵逼近了。莱奋生认出是哥萨克。敌骑兵已经非常逼近了，连马蹄声和低语声都听得见了。只是当敌人的面孔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莱奋生才下令："打！"敌人大败而逃，游击队乘胜追击，夺取了麦杰里察牺牲的那个村子，并在这里驻下来过夜。

夜里，当疲惫的游击队员们睡得正酣时，从村后哨兵站岗的地方传来三声信号枪声，又响起了哨兵的枪声，接着枪声大作，敌人的骑兵疾驰而来，一片黑压压的、数不清的人头和马头，像雪崩似地向村子里压过来。游击队进行了一阵紧张的抵抗之后，用全速向那片黑魆魆的树林奔去。巴克拉诺夫带着杜鲍夫的一排人留下掩护撤退，其余的人牵着马冲进了密林深处。莱奋生两腿微瘸地走在最后。不一会儿，队伍忽然停下了——前面是一片无法通过的、粘性的、黑色的沼泽地。眼下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顺原路退回去，但那里已被敌人封锁了。人们被绝望和愤怒控制着。他们在寻找造成他们的不幸的罪魁祸首，——不用说，这就是莱奋生！……假如此刻他们能看到他，一定会用全部力量向他扑去。

突然间，他果真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手里高擎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了他那留着大胡子的、青白色的脸。他咬紧牙齿，一双目光如炬的、滚圆的大眼睛迅速地在人们脸上移动着。霎时间肃静无声。莱奋生嘶哑地喊道："听我的命令！我们要在沼泽地里铺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接着他命令一部分人去增援巴克拉诺夫和杜鲍夫，其余的人全都砍树铺路。

这一大群安静下来的、精神沮丧的、挤做一堆的人们，方才还在失望中举起胳膊，准备杀人和痛哭，这时却突然听话地、以超人的速度疾风骤雨似地行动起来。转眼间拴好马，斧声叮叮，赤杨在腰刀的砍伐下发出折断的音响。他们脱掉大衣干活，失掉了对时间、空间、自己的身体和劳累的任何感觉。

枪声愈来愈近。巴克拉诺夫接连派人来问：是不是快铺好了？他已丧失了将近一半的战士，杜鲍夫也牺牲了。游击队员只好一寸土、一寸土地退让。最后退到大伙砍树铺路的地方。敌人的子弹在沼泽上空频频呼啸，有几个砍树的人已经负伤。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路铺好了。部队呐喊着，几乎是同时涌上树枝铺的路。最后通过的是莱奋生和爆破手，后者已经安放好地雷，就在敌人抵达渡口那一瞬间，树枝铺成的路腾空而起。

游击队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人们精神疲惫、神志沮丧地跟在莱奋生后面走着。莱奋生疲倦得要死，眼睛不住地要合拢来。巴克拉诺夫对他说：

"应该派个巡逻。"

"对，对，应该派；就请你下令吧……"

巡逻派出去了，一个是密契克，一个是莫罗兹卡。

密契克和莫罗兹卡相隔约有五十俄丈。密契克昏昏欲睡地信马走着。当他一抬头看见哥萨克时，使轻轻地惊呼一声，滑下马鞍，逃跑了。

莫罗兹卡仗着前面还有一个巡逻，对周围情况也就不十分注意。当他看

见哥萨克时，毫不犹豫地朝空中放了三枪。就在这一刹那，他和他的马倒在了地上。

听到枪声，莱奋生震颤了一下，回头一看，见巴克拉诺夫和游击队员们脸上都流露出不怕牺牲的、最伟大的、真诚的激情，他们在等待命令。莱奋生被他们那股内在的力量所激发，挺直了腰杆，猛然地拔出军刀，目光炯炯地喊道："冲出去！"并一马当先地疾驰起来，游击队员们紧跟着冲上前去。

冲出敌人的埋伏圈后，只剩下了十九个人。莱奋生用迷惘的眼神异样地、痛苦地、久久地望着他们，流下了眼泪。

"巴克拉诺夫在哪里？"他问。

"巴克拉诺夫牺牲了。"

莱奋生心里一阵剧痛，又哭了起来。

他们十九个人走出了森林。前面呈现出大片高高的青天和阳光照耀着的、一望无际的、收割过的棕黄色的田野。莱奋生用泪眼默默地扫视了一下这辽阔的天空和这给人以面包与憩息的大地，望着在远处打麦场上的人们，他不哭了。他相信，那些人很快就会变成亲近自己的人，就像默默地跟在他后面的那十八个人一样。

《毁灭》是一部歌颂无产阶级、歌颂革命斗争的好作品。它写得真挚感人，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莱奋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

莱奋生的形象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的形象。他精神境界崇高，心灵美丽，是苏联文学中共产党员形象画廊里最令人起敬和热爱的人物之一。

莱奋生是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事业。"他除了革命的利益外，没有其他利益。因此，他在部队里深得群众的信赖、拥护和爱戴，游击队员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生来不同寻常的、永远正确的人。"一致选他为队长。其实，他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而是在革命斗争中由于勤奋学习，努力实践而成熟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作者指出，他和其他一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历了一个艰苦磨练和严峻考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把自己和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认清了生活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树立起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决心献身革命，为彻底摧毁旧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

作为军事指挥员，莱奋生具有战略性的远见。他时刻搜集敌情，掌握敌情，根据敌情做出了尽快转移的正确决定。他沉着冷静，在紧急关头能当机立断，做出抉择。当被敌人追逼到一片沼泽地时，他果断地决定在沼泽地自己伐树铺路。他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终于完成了"保存战斗单位"的任务。

莱奋生是游击队的指挥员，又是政治指导员。他具有一个党的领导者所应具备的品质特征：一方面他热爱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群众的代表，群众的领导者，不断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促使他们——新人的品质尽快形成。他明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改造现实生活的斗争过程也就是新人诞生成长的过程。因此，他对于人类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是，他也明白，新人诞生和成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善于抓住每个时机对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个别谈话，群众讨论，必要时，为了维护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也采取强制手段，如用手枪威胁一青年下水捞鱼。

莱奋生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夜间查岗时怕惊走值班人脸上的微笑那一场面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理解值班人的微笑是心灵里纯洁感情的表露，是革命战士在严峻的战争中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对美好的未来的憧憬，是革命本能的流露。设想，在战争动乱年代的深夜，在荒野的篝火旁边，一位指挥员竟能理解到普通战士微笑的内含，竟能想到“怕把值班人脸上的微笑惊走”，这是多么高尚丰富的精神世界啊！

此外，作者还描写了他以坚强的意志克服病痛、同巴克拉诺夫开玩笑。他对人对事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巧妙地把自己的决策通过群众讨论的形式贯彻下去。同时，他也有普通人的感情，如对妻子的深情等。但是，莱奋生又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他不但没有英雄人物那种魁梧矫健的身躯，而且也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功绩，甚至他不但有时动摇，还有时失策，使一百五十人与敌人遭遇，结果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然而，这样刻画出来的人物却令人感到真实可亲，因为没有缺点的完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莱奋生游击队的基干是杜鲍夫矿工排。在苏联作家中，法捷耶夫最先成功地塑造了战争环境中的工人形象，其中有：忠厚朴实、谦逊好学、有时还表现出孩子气的青年工人的典型巴克拉诺夫；体现了工人阶级的特征——自觉的革命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和阶级的自豪感的杜鲍夫；政治觉悟高、沉着冷静、头脑清醒的冈怡连柯；而作者着墨较多的则是莫罗兹卡，对他的出身经历、心理活动、行为感受，以及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莫罗兹卡是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他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点上，在他身上体现了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参加游击队后，他成了一名慓悍勇猛的战士，但也把旧的思想作风带到革命队伍里来了，如违抗命令（不愿去送公文），偷瓜，酗酒，吵嘴打架，说脏话，对妻子的粗野。这些从旧社会因袭下来的不良作风是他进步缓慢的原因。可是他在一段时间内却认识不到这点。他觉得‘他毕生都在全力以赴地力求走上莱奋生、巴克拉诺夫、杜鲍夫……等人所走的那条在他看来是明确的、正当的、笔直的道路，但是总有人在执拗地阻挠他。他再也没有想到，这个敌人就在他自己心里”。

但不管旧社会的烙印在他身上有多深，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仍是他精神面貌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经过领导、群众对他的批评教育，他开始自觉地同自己头脑中的落后思想进行斗争，如在渡口他批驳谣言，整顿秩序；对瓦丽亚的态度变得合乎人情了。他的新思想不断地成长，新人的性格不断发展成熟，在最后同敌人遭遇的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他的阶级本质使他放出了灿烂的异彩：他想到的是后面的同志们，而不是自己；为了向后边的同志们报告前边的敌情，他把手枪高举过头顶，连放了三枪。战友得救了，队伍保存了，革命胜利有望了，而他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莫罗兹卡的形象在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个人物控诉了旧世界对人的摧残，歌颂了新世界对人的改造和新人在革命斗争中的诞生与成长。

同莱奋生、莫罗兹卡等完全不同的人物是密契克的形象。这是一个市侩和叛徒的典型。他的性格特征是骄傲自大、孤芳自赏、意志薄弱、怯懦无能。从表面上看他是很“规矩”、很“道德”的：他“真诚”、不贪女色，不偷盗、不骂人，但是他内心深处却潜藏着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王国。他是抱着骑士般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不费多大力气就可以捞到英名的野心来参加革命的。但现实斗争是艰苦的，无情的，不存在他所追求的那种“安

宁、睡梦、静谧……”要成为激烈斗争中的革命英雄这件事更与他无缘。于是，他参加游击队时的“真诚的感情”消失了，他以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对待革命，从内心深处鄙视无产阶级事业和无产阶级本身。他拒不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与革命和周围的人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内心的斗争也越来越剧烈。这样，便产生了“要千方百计地设法尽快离开部队”的可耻念头。最后终于发展到在紧要关头当了逃兵，坑害了游击队。

密契克由革命的同路人成为革命队伍的逃兵的过程说明：凡是抱着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投机革命的人，必定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以“毁灭”而告终。

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表明了这样一些思想：苏联的革命和内战不是人民大众的自发运动，而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自觉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一切敌对的都被革命扫荡掉，一切不能从事真正革命斗争的或偶然落到革命阵营里的都被淘汰掉，而一切自觉革命的则受到锻炼、改造，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和具有高尚品质的社会主义新人。

小说的艺术手法完全服从表达主题思想的需要。作者刻画人物的特点是，人物的行为全由其性格逻辑所支配，人物的肖像是抓住最能显示其性格特征的部位进行描写，如莱奋生的眼睛又大又蓝，像湖水一样深，这是他思想敏锐、观察犀利和有远见卓识的表现；而密契克的脸色是苍白的，这是他软弱、追求空幻、远离人民、灵魂空虚的反映。作品在结构上的特点是，分别描写不同人物的几章，就用人名作标题：第一章——莫罗兹卡，第二章——密契克，第六章——莱奋生；把两类人物放在对比之中交替描写，并以游击队的行动把这一切统一为一个整体。

《毁灭》以运用深刻的心理分析手法见长，如对莫罗兹卡转变前后激烈的内心矛盾的描写，对密契克逃跑前后紧张的心理冲突的描写等。

景物描写与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心理状态密切相联，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如行军时所见的秋天的原始森林、艰难地强渡泥沼时的密林深处、结尾时的明朗的打麦场等。

法捷耶夫继承了高尔基的创作传统，展示了为实现革命目标而斗争的人民的苦难、战斗，成长和胜利前景，以及他们之中的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莱奋生正是巴威尔·符拉索夫那样的无产阶级英雄，他领导的游击队和巴威尔领导的革命小组一样，最后虽然遭到了摧残，但给读者的不是悲观主义的情绪，而是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小说寓意深刻的结尾，诗情画意的描写，形象生动地说明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革命前途无限光明，革命一定取得最后胜利。

同二十年代苏联一些把革命和内战表现为自发现象、把共产党人的形象公式化了的作品相反，法捷耶夫在《毁灭》中正确地反映了革命和内战是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自觉革命运动、成功地塑造了丰满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些，再加上心理描写和性格刻画的艺术技巧使小说异于或优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成为苏联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瑰宝。

《青年近卫军》

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是法捷耶夫的代表作品，是一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伟大史诗。它不仅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大大丰富了世界文苑。《青年近卫军》原书在一九四五年出版，曾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后来又作了修改与补充。于一九五一年再版。迄今已经印刷了一百五十多次。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堪称苏联革命文学中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悍然入侵苏联。当时的苏联由于缺乏充分的准备，致使在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重大损失。红军不得不被迫暂时撤退。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苏联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通道上，有一座小城——克拉斯诺顿，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被德寇占领。不久城里出现了“青年近卫军”。这支小小的地下队伍以它勇敢的行动，使侵略者受到了重大损失。它准备在苏军到来之时发动武装起义。但是，在苏军解放这座城市的前一个月，“青年近卫军”不幸被敌人发现，五十六名队员遭受了惨绝人寰的酷刑之后统统被敌人野蛮地杀害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根据“青年近卫军”的卓越功勋，追赠五名总部委员以“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并授予其他一些队员以爱国勋章。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的题材基础就是克拉斯诺顿地下青年组织活动的历史事实。法捷耶夫仔细研究了与这支地下队伍有关的文件，从死者的亲属和活着的队员那里搜集了大量材料，据此写成了这部杰出的作品。

《青年近卫军》分为两部，共六十五章。第一部主要写德寇进逼、占领克拉斯诺顿，当地机关、企业、居民进行疏散、青年们酝酿成立地下抵抗组织。第二部主要描写在党的领导下。“青年近卫军”组织成立，英勇地对敌斗争及队员们悲壮殉难的结局。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苏联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红军接连放弃了好几个据点，顿巴斯的土地一片跟着一片地失陷了。七月份德军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红军撤退的部队如潮水般地正向克拉斯诺顿涌进。驻守在城里的军官，政府机关的职员都纷纷离开。整个克拉斯诺顿笼罩在撤退和匆促疏散的紧张气氛中。

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发出撤退的命令：一切重要物资和设施能运走的运走，不能运走的立即破坏掉或炸毁。所有的州和区应当留下的领导人员要参加疏散的组织工作。在德寇来了之后，都要消失得无影无踪，潜入群众中间，转入地下斗争。

在一个房间里，坐着三个人。他们打开窗子，让穿堂风把烧文件的烟雾吹散。普罗庆柯是本州地下工作领导人之一。他大约三十五岁左右，身材矮小而匀称，刘季柯夫是留下来担任地下区委书记的。他年纪稍大，已经五十开外，最近担任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中央工厂机械车间主任。和刘季柯夫一块做地下工作的伙伴是舒尔迦，年纪四十五岁左右。他原是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北部一个农业区的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区现在已失陷了。他主动要求参加地下工作。地下区委的另一个领导人是机械工程师巴腊柯夫，此时他不在这里。

整个克拉斯诺顿人的心情没有一个人像他们三个人那样镇定，同时又那么慷慨激昂。他们在研究当前的工作计划，交换着秘密接头地点。普罗庆柯

马上要到游击队根据地去。刘季柯夫暂时要藏在房东那里。舒尔迦虽是本地人，但已很久没回来了，这里很少有人认识他。他只好去找组织上给他的一个地址。结果他藏身的这一家是一个伪装进步，隐瞒富农身分的工人家庭。

几个星期前，谢辽萨跟许多妇女和少年到通往伏罗希洛夫格勒的要冲去挖工事。工事交工后，大家都回家了。谢辽萨却要求留在部队里，可是无论如何也没得到允许，但是他赖着不走。敌人来进攻，他就跟战士们一块儿战斗。他还亲手打死了两个德国兵。连续几昼夜，他们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后来就没有人撵他了。这个团队的任务是死守阵地，拖住敌人。他们被敌人包围了好几昼夜，大多数人都阵亡了，上校受了重伤，他几次动员谢辽萨离开部队。他说，他们反正都要牺牲的，“你年轻轻的，何必把命送掉。”谢辽萨离开之前，把死人身上的武器收集拢来，送到小壕沟里埋好了才和上校告别。他自己留了几个小型手榴弹和两支勃朗宁手枪。夜里回来，他先把武器埋在菜园里，然后才去敲自家门。谢辽萨虽然已经五六天没合眼了，但是由于兴奋，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他叫醒姐姐娜佳，把这些天的经历告诉了她。

“你会送命的！”娜佳害怕地说。

“情愿死，也比舔敌人的靴子苟且偷生强。”谢辽萨坚决地说。

娜佳是陆军医院的护士。她告诉谢辽萨，医院里还有一百多个不能走动的伤员，由费多尔医生陪他们留了下来。

“我真担心德国人来了会弄死他们！”娜佳忧愁地说。

“最好让居民们分别把伤员接到自己家里！”谢辽萨激动地说。

谢辽萨·邱列宁是矿工的儿子，他是家里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受尽了风吹雨打，烈日严寒，像小草似地成长起来，所以任何艰难困苦他都能克服。

谢辽萨有一颗鹰之心。年纪小小的就梦想建立功勋。他很调皮，在学校里经常搞些恶作剧，如，上课时从书桌底下放出一群麻雀，课间休息从学校二楼往操场院子里跳……。这些出奇的胡闹，招来的是一顿毒打。他差一点儿被学校开除。

后来他从书本中得到了另外的启示。现在他所追随的是那些英雄人物——伏龙芝，契卡洛夫，巴巴宁等人。他坚信只有这些英雄人物的荣誉才是真正的荣誉。

战争爆发时他三番五次要求参军，进军事学校，当飞行员，可是人家不收，说他太年轻，让他明年再来。

这天一清早，谢辽萨的好朋友维嘉就来看他。他们俩在土屋后边的小河边上，一边抽烟，一边交换着新闻。

维嘉说，福明家里藏着一个陌生人。还有“干草场”区过去做过弹药的地方，在敞着的地窖里，留有十几个燃烧瓶，要把这些瓶子藏起来倒不错。此时，谢辽萨忽然想起来应当到医院去一趟。

娜佳把他们领到医生办公室。他们很快就和费多尔医生谈妥，并且得到了助理护士鲁莎大婶及市立医院青年女医生的支持，他们一致同意把伤员送到居民家里去。

从医院出来，他们俩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心情和自豪感。那种不可压抑的，要斗争的渴望，在他们心里几乎要满溢出来。

突然，谢辽萨说他要去打听一下福明家里到底住的是什么人。

不一会儿，他就到了远离市场的“上海”区，来到福明的土房门口。

“对不起，公民，”谢辽萨说着就从福明抵着门框的胳膊下钻了进去，不仅到了门厅，而且到了上屋。福明甚至来不及惊奇就马上跟过来时，谢辽萨温顺地鞠了个躬。福明个子瘦长，冷酷的长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甚至有点发怒的表情。

谢辽萨说他和孩子们在街上碰见了一个没有撤退的伤员，所以来找他，请他帮忙，收留这个伤员。

福明说他家没地方，而且他老婆有病。

“大家都知道你还有一间房子。”他不等福明出声，就一步跨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这个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百叶窗半掩着，桌旁坐着一个穿工作服的人。那人肩膀浑圆有力，头发剪成平顶式，年龄大约四十五岁左右，他抬起头来，非常镇静地望了望走进来的谢辽萨。

就在这一刹那，谢辽萨明白了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坚定刚强的好人。

谢辽萨和维嘉他们在几小时内，就为七十多个伤员在城里各区找到了住处，但还剩下四十多名伤员无处安置。

这一夜，谢辽萨和维嘉把“干草场”仓库里的燃烧瓶搬到“上海”区来，埋在峡谷里的灌木丛下。他们每人在自己家的菜园里也埋了几个，以便必要时使用。

黎明时分，谢辽萨就到了城外的草原上。他站在公路旁的一个不大的山岗上，纵目四望，全 城景色尽收眼底。然后他又爬上了一个灌木丛生的山岗，从那里可以看到全区。他在树下躺了好几个小时。太阳已经西斜了，这时从远处小丘后面向大路爬出一只深色的长龙，这队伍前面是摩托车兵，后面是卡车，队伍长得没有尽头，千百万辆卡车组成的一个个纵队，中间夹着指挥官的小汽车。卡车好像一条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绿色巨蟒，不断地从地平线上蜿蜒地游出来，尘埃滚滚，笼罩着公路上空。谢辽萨是第一个看见德寇开进克拉斯诺顿的人。

谢辽萨抄近路回到城里。他想到，公园里的高尔基学校的屋顶最高，从那里可以瞭望全城，他就径直奔去。他正要从一家花园的栅栏溜过去，不料看见了前天夜里他搭乘汽车时遇见的那个姑娘，她正在花园里槐树下的草地上看书。

“你在看什么啊，姑娘？德国人开进了克拉斯诺顿了，难道你没有听到枪声？”谢辽萨怀着极大的勇气，跳进了栅栏，站在她的脚边，抑制着紧张的心情说道。

这个姑娘叫华丽雅·鲍尔茨。她是高尔基学校九年级的学生。华丽雅是个早熟的姑娘。她那深色睫毛下面的深灰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独立不羁的傲慢的神色。她梳着两条金光灿灿的辫子，丰满娇艳的嘴唇显出自尊心很强的样子。她读过很多书，钢琴弹得很好。她还梦想做一番英雄业绩。她曾几次要求到航空学校学习，但是每次都不收她。每当想起这件事，她就伤心。现在德国人要来了，她该怎么办？会不会出什么事？这些问题一直在苦恼着她。所以，这几天她总是在花园里看书，以消除内心的苦闷。前天夜里她才和同学从农场劳动回来。谢辽萨是在途中偷偷爬上她坐的那辆汽车的。由于他们已经见过面，所以很快就谈妥，由华丽雅作向导，一块儿到高尔基学校去看德国人。

这是一幢用红砖砌的宽大的二层楼校舍，位于煤业联合公司大厦对面。

他们沿着狭窄的楼梯迅速地爬到阁楼上。透过窗户看见了煤业联合公司的二层楼大厦。德军已经把它作了总部。所有的窗户都开着。谢辽萨看到了这一切，不自觉地把每个细节都记了下来。

回家后，谢辽萨听姐姐娜佳讲述了关于四十多个伤员和费多尔医生被德国党卫军枪杀的悲惨情景，气得一言没发，一头扑到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复仇的念头使他浑身发抖。他想到了学校的阁搂，突然发现了出路。“你们等着吧，只要天一黑！”他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盘算着，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他一定要实现他的计划。

夜里他溜进了菜园，掘开埋着燃烧瓶的坑，两个裤袋里各塞了一个燃烧瓶，怀里还揣了一个。趁着七月之夜的黑暗，他又偷偷地溜进了公园。顺着白天的路线，来到了学校的阁楼上。他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城里的一切都寂静下来，大厦旁边的活动停止了，窗户内的灯都已熄了，他才开始行动。他摸出一只燃烧瓶，抓住了瓶颈，用力一投就把它扔进楼下一扇开着的窗户里，然后把第二个瓶子又扔了进去，接着第三个瓶子被扔进了二楼的一扇窗子里。

他听到瓶子的碎裂声，紧接着火光冲天。他像箭似地跑下楼去，奔到最近的房间，急忙打开窗子，跳到公园里。他弯着身子跑到公园的绿荫深处。回头看见一片巨大的，在天空不断扩展开来的火光，他心花怒放，飘飘欲仙了，他浑身发抖，几乎克制不住要纵声大笑的愉快心情。

奥列格·柯舍沃伊是高尔基学校的学生。他是个有志青年，虽然才十六岁，但是思想比较成熟。早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受到威胁时，他就要求共青团区委会吸收他参加地下工作，但被拒绝了。共青团发出撤退的命令后，他只好随同柯里亚舅舅、舅妈等一块疏散了。

他和许多逃难的人一样，刚逃到顿涅茨河的渡口，还没来得及过河，敌人就来了，他和大家一块被占领者遣送回家。当他明白自己已走不掉时，心里突然想到？现在是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了。

逃难的人们夜里抵达克拉斯诺顿城郊。因为城里戒严，他们只好在峡谷里过夜。新一号井井长瓦尔柯也和他们一块儿返回家乡。这一夜，大家都很焦急，久久不能入睡。瓦尔柯去观察地形，看峡谷通向哪里。突然他听到背后有脚步声，转过身来，在明亮的月光下，认出了是奥列格。

“瓦尔柯同志，我迫切需要跟您谈谈。”奥列格略带口吃地轻声说。

“帮助我在城里找一个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吧！”奥列格不等瓦尔柯开口他就直盯着瓦尔柯的眼睛说。

瓦尔柯猛地抬起头来，把奥列格的脸仔细端详了一番。站在他面前的是最年轻的最有理想的一代人。不由心中产生了无限喜悦和信任之感。

“地下工作者，你似乎已经找到了。”瓦尔柯笑着说。

“至于以后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吧。”

最后，瓦尔柯告诉他要跟青年人保持联系，不要暴露自己，要物色一些对工作合适而又意志坚强的青年。瓦尔柯一再叮嘱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什么事也别干，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到时候会找他的。

奥列格怀着难以形容的兴奋心情，向宿营地走去，一种不可遏止的要斗争的愿望，要发挥自己作用的决心占据了他的身心。

奥列格他们撤退不成返回家后，维拉外婆就把一大堆城里的新闻告诉了他们：两三天前，在几个地方发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另外听说卫戍司

令部命令职工们去上班。她说，机械工程师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已经到煤业联合公司的中央工厂去工作了。巴腊柯夫当了厂长，刘季柯夫担任了机械车间主任的原职。

作为将要投身于斗争的青年，再没有比过着屈辱的生活更为难受的了。奥列格家可爱的毛茸茸的黑狗被德国人打死了，院里的树木花草被砍光了，外婆和母亲，还有年轻的舅妈被逼得给住在他们家的德国将军和军官们当杂役。奥列格明白住在他家的这个冯·文采尔男爵将军是使他们受到屈辱的罪魁祸首。他恨不得一下子打死这个穿着雪亮皮靴，喉结洗得干干净净的老头。

一天，奥列格的朋友斯巧巴受华丽雅·鲍尔茨的委托来找他。华丽雅是奥列格的同学，他们两家的家长早就认识，过去经常来往。在华丽雅家的花园里，除了华丽雅之外，还有一个瘦高个子的青年，他光着脚，又卷又硬的淡色头发偏分着，嘴唇有点翘。

“这是谢辽萨·邱列宁。”华丽雅介绍说。奥列格同他握手相见时，谢辽萨以审视的眼光望着他——一个高大、矫健、宽肩、浅发、非常年轻的脸，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的两颊红润，颧骨突出，目光炯炯，衣着整洁。他的样子给人一种朝气勃勃、有力、善良、心地纯洁的感觉。

“奥列格，给我们介绍一下地下工作者吧！大家都知道，你们家过去常有党员来往。”

“我的关系都丢失了，但是我想地下组织肯定会有的，因为有人发传单。我看火烧司令部的事也一定是地下组织干的。……我得到消息，最近共青团员可能得到指令，告诉我们干什么。”奥列格说。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手在发痒！”谢辽萨苦闷地说。

谢辽萨和奥列格一块儿出去了。他们边走边谈着。谢辽萨告诉他，火烧司令部的事是他自己干的。奥列格沉默了一会，略带口吃地说：

“干得好，只是一个人，不——不好。”

谢辽萨把自己到福明家去的事也告诉了他。又说，那个人现在已经被福明出卖了。福明本人也进了“警察队”做事去了。这个“警察队”设在德国野战军党卫队下面，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据说一个叫索里柯夫斯基的流氓当队长，现在就靠他招募各式各样的流氓当警察。

奥列格也向谢辽萨阐述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为了使事业不受损害，他嘱咐谢辽萨要特别谨慎地一步一步地去寻找通往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道路；并告诉他去考察青年人，挑选最可靠、最坚强、最适合做地下工作的人。最后奥列格吩咐谢辽萨去打听城里有哪些人被捕、关在什么地方，要设法帮助狱里的同志；要在德国兵士之间侦察德国司令部的一切军事的和民政的措施。

他们商量好，以后通过华丽雅·鲍尔茨彼此取得联系。

沃洛佳·奥西摩兴由于父亲去世，中学没毕业就进工厂做工了。他一直在刘季柯夫的车间里当钳工。由于他动了阑尾手术，伤口化了脓，所以没来得及撤退。德国人来了以后，他不准备给德国人干活，但自从新任厂长巴腊柯夫的上工命令公布后，他不只一次地和自己的好朋友托里亚商量，应当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根本不能为敌人工作，但要斗争，要参加地下工作或者游击队。但是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在哪里，他们怎么去找？现在又靠什么生活？则一筹莫展。

一天傍晚，刘季柯夫亲自到沃洛佳家里来找他去上工。沃洛佳认为刘季

柯夫回工厂工作并不是出于迫不得已，更不是由于胆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大概有更深一层的想法，所以他就大胆地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他说他不想去上工，他要斗争。刘季柯夫朝门那边微微点了点头。

“嗯，……我有任务让所有的人都回厂工作……我们替他们先干一阵……”

沃洛佳马上一切都明白了。刘季柯夫叫他找几个可以信赖的同学并和他们建立联系。沃洛佳当时就把他的三个最好的同学——托里亚、若拉和万尼亚提出来。后来，刘季柯夫交给他一项任务：区党委撤退时把一个印刷所的铅字埋在公园里，要他们去侦察一下能不能挖出来。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有党作后盾，党组织决定要建立一个青年小组，我就是为此事来找你的。今后，没有跟我商量过的事，千万不要采取行动……明天去上工吧！”

万尼亚·捷姆奴霍夫是共青团员，身材很高，背有点驼，戴一副近视眼镜，他很傅学，在学校被称为“教授”和“诗人”。他说话不慌不忙，平时不大开口，有点腼腆，但为人诚恳热情，喜欢帮助别人。今年夏天考入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法律专科班。他和同学若拉为了帮助组织做疏散工作，所以没赶上和学校一块儿撤退。若拉也是一个爱书如命的青年。他俩撤退受阻回来后，就跟沃洛佳、托里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若拉住在新村里，屋子很小，德国人对这个地方瞧不上眼，这就给他们几个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联系地点。

第二天，他们几个人在若拉家里研究了行动计划。万尼亚建议立即把奥列格吸收进来。万尼亚和奥列格早在共青团积极分子会议上就建立了友谊。他们俩是在撤退的路上相遇，又一块儿返回克拉斯诺顿的。万尼亚说奥列格是个可靠的人，一个真正的青年。他对留在城里的高尔基学校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非常熟悉，他家又住在公园附近，这对完成任务很有帮助。

当夜他们三个人就来找奥列格。因为奥列格家住着德国人，他们就偷偷地趴在奥列格邻家菜园的苦艾里。万尼亚把沃洛佳和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的事告诉了他，并把接到的任务也对他说了一遍。

没有一件事情能像听到这个消息那样地激起奥列格的活跃的天性。霎时间他觉得除了瓦尔柯再没有别人会给沃洛佳这样的任务。

早晨，奥列格听到院子里有个少女的清脆的声音在高声问话。

“奥列格·柯舍沃伊是住在这里吗？”

奥列格探出头来，看见在台阶旁边站着一个姑娘正和哨兵说话。姑娘打扮得十分艳丽，她的衣服绚丽夺目，头发高高耸起。她通体给人以一种非常自然、活泼轻快的印象。

“我就是柯舍沃伊，您到这边来吧！”奥列格从柴房走出来说。

她拉着另外一个姑娘一块走过来。这个姑娘的脸是粗线条的，给太阳晒得黝黑，深色的头发非常浓密，一个个沉甸甸的发鬈衬托着她的双颊，两道翅膀般的眉毛和褐色的大眼睛流露出勇敢和正直的气质，同时也显示出有力、挑战、热情和想象力丰富的表情。

奥列格把她俩领进他和柯里亚舅舅住的柴房之后，那位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说，她们是安德烈叔叔派来的。“我叫刘勃卡·谢夫卓娃。”她自我介绍说。

早在去年秋天就选拔出一批共青团员归游击队司令部在敌后调遣，刘勃卡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军医训练班快毕业了，又被调到伏罗希洛夫格勒无

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学习。她的生活笼罩着神秘的气氛，这正合她的心意。她是个“女演员，刘勃卡，像狐狸般狡猾，”她一向在演戏。

刘勃卡从小就想当英雄，她瞧不起女孩子，和男孩子打仗她非赢不可。再大一些，她又爱上了跳舞，还有一副好嗓子，一心想当演员。战争爆发后，她经常给军人表演。她心里总有一种五光十色的东西在变幻，在闪耀，在燃烧。现在她又梦想到前线去建立功勋。她希望当个飞行员，起码当个军医。结果她却在敌后当了一名普通无线电报务员兼侦察员。当然，她对这项工作也很热爱。

七月份训练班主任找她谈话，让她回克拉斯诺顿家里待命。嘱咐她如果德国人来了，她的行动应该不要引起敌人的怀疑，并且给了她一个联络地址。

瓦尔柯和伙伴们分手后，在草原上躺了一天，等到天黑才偷偷地溜到老朋友谢夫卓夫家里，也就是刘勃卡家里。

刘勃卡和她母亲热情地接待了他。瓦尔柯告诉他们以后要叫他“安德烈叔叔”，然后，他请求给他换上一套谢夫卓夫穿过的工作服，以免暴露身分。

经过一段闲聊，瓦尔柯终于对她们母女说：

“我真没料到，命中注定让我带着不幸的消息来见你们，但是我不愿欺骗你们，你们的亲人，你的丈夫，刘勃卡的父亲，我最好的朋友葛利高刊·伊里奇死了……被德国刽子手向和平居民投下的炸弹炸死了。”

刘勃卡的母亲并没有惊呼，轻轻地哭了起来。刘勃卡脸色苍白，愣住了，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突然昏倒了。

当悲伤与痛苦的风暴过去之后，瓦尔柯才开始讲述谢夫卓夫遇难的经过。吃过饭他把刘勃卡叫起来，跟她谈正经事。

“我一眼就看出你是留下来工作的。我只求你帮我的忙……”他请求刘勃卡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过一夜，然后帮他跟康德拉多维奇取得联系。

刘勃卡把他安顿在邻家柴房阁楼上的干草堆里过夜。第二天便和康德拉多维奇接上了头。康德拉多维奇是个老游击队员，是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凭借刘勃卡和康德拉多维奇等人的帮助，瓦尔柯花了几天工夫就探听出了德国人在城里着手进行的工作，并跟留在城里的党员及一些可靠的人建立了联系。

瓦尔柯觉得他能与州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惟一线索是刘勃卡。他猜测她是个侦察员，在时机未到之前她是不会泄露什么的。因此，他决定单独行动，希望所有通往终点的道路迟早都会汇合起来的。所以他叫刘勃卡去找奥列格，现在奥列格对他有用了。奥列格问她是否可以亲自去见见安德烈叔叔。

刘勃卡带着神秘的微笑说：“不、不行，不能见他。说实在的，我们的问题是恋爱问题啊，……来，认识一下，她叫妮娜·伊万卓娃。现在你们一块手挽着手到什么地方去溜跶溜跶，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一出门妮娜就谈起正经事：

“安德烈叔叔希望知道你们中间是否有这样的青年，他能探听出我们的人有谁关在监狱里。”

奥列格告诉她谢辽萨是个非常机灵大胆的青年，他正着手干这件事。他还把福明出卖地下工作者的事、以及万尼亚说的地下工作者正在找瓦尔柯的事都告诉了她。然后奥列格把若拉的地址给了妮娜。这样若拉就可以通过沃洛佳，把一切消息传到需要的地方。

妮娜和她的堂姐奥丽雅早在州委会设在克拉斯诺顿时，就已经是州委的

联络员了，她对侦察工作是有一定经验的。奥丽雅和妮娜·伊凡卓娃的家离刘勃卡家不远，她们的父亲都在同一矿井里工作，所以她们早就认识，而且经常来往。

奥列格和妮娜沿着公园街边走边谈着。奥列格乘此机会正好执行侦察公园的任务。他边走边数着公园里的高射炮和卡车的数量。妮娜提醒他屋顶还有一挺机关枪和两个德国兵。他认为要把铅字挖出来是不容易办到的。

妮娜一到家就把从奥列格那里听到的一切告诉了奥丽雅。奥丽雅就立刻到“上海”区把这一切汇报给瓦尔柯。这实际上是把克拉斯诺顿地下工作的全部环节最后联结起来的真正决定性的时刻。

妮娜来到毕尔沃马伊卡村，她转告阿纳托里和邬丽亚，要他们马上跟奥列格建立联系，拟定一批可靠的，愿意跟德国人斗争的男女青年名单。妮娜走后，邬丽亚和阿纳托里便对毕尔沃马伊卡的男女青年逐个地进行了挑选。

自从瓦尔柯和刘季柯夫建立联系的那天起，区里的一切怠工和破坏活动的秘密线索就交给了瓦尔柯，因为瓦尔柯非常熟悉克拉斯诺顿各个矿井的情况。

德军占领克拉斯诺顿之后，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经济管理机关——第十办事处。现在所有的矿井，企业，财产，装备以及工人都归它管辖。这个办事处的计划是要把苏维埃顿巴斯的煤和金属材料源源不断地流进德国“东方公司”的口袋里。第十办事处主任施维德下了一道命令，叫全体矿井和工厂的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立即前来上工。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就是这样应召来中央工厂工作的。

机械工程师巴腊柯夫是个体格强壮而匀称的人，虽然已三十五岁，看上去显得非常年轻。他在施维德的办公室里以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博得施维德的欢心，这位中尉先生除了接受他的奉承之外，已经毫无办法了。

巴腊柯夫当了厂长以后，跟施维德主任，特别是跟他的副手费尔德纳很接近。费尔德纳喜欢随便乱讲，因此巴腊柯夫很容易就了解到一些行政当局的经济措施和其他情况。

在巴腊柯夫和费尔德纳会面之后，仅仅几个小时，在克拉斯诺顿街上，就突然出现一个谦逊文静，容貌不大端正的、脸晒成古铜色的姑娘——奥丽雅。局外人难以发现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奥丽雅把西红柿拿到一家去卖，然后又到另一家去串门。可是过了不久，德国人的一切美好计划都莫名其妙地化为泡影了。奥丽雅现在是瓦尔柯的联络员。

为了营救舒尔迦和其他狱中同志，刘季柯夫好几夜辗转不眠。他和瓦尔柯一直在准备组织一支战斗队去劫狱。

突然，城里各区进行了大逮捕。奥丽雅和妮娜跑来找奥列格。她们传达了康德拉多维奇的话，说“安德烈叔叔”被捕了。瓦尔柯是偶然遭到搜查的。敌人要搜查的是女房东的丈夫。在搜查时福明认出了他。

奥列格让妮娜把这件事通知给刘季柯夫的联络员波里娜·盖奥尔吉叶芙娜，让她把这一切转告给刘季柯夫。

“青年近卫军”已经正式成立了，并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奥列格被选为政治委员，杜尔根尼奇为指挥员，邬丽亚、万尼亚、谢辽萨、刘勃卡及斯塔霍维奇为总部委员。

伊凡·杜尔根尼奇是个红军中尉，因受伤被俘。敌人在撤退时向他开了枪，但他没死，被老百姓救出来，伤愈后他就回家了。斯塔霍维奇自称是游

击队派来做地下工作的。

“青年近卫军”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计划是散发传单。他们首先贴出了“告公民书”，向全城人民宣布：“青年近卫军”的成立，并揭露敌人的侵略罪行，报道战争的全部真相，以此鼓舞人们的斗志。

早晨，有人发现在市场尽头的布告板上贴着一张有“青年近卫军”署名的传单。人们越来越多地集聚在布告板旁边，伸着头，读着传单。一股难以克制的力量迫使他们把这张传单读了一遍又一遍。

一个带“警察”肩章的，个子高高的人走进人群，人们回过头来一看，认出是福明，顿时给他让开一条路。

谢辽萨把帽子拉到眉毛上，免得福明认出他。然后向人群中的庇罗诺克使个眼色，庇罗诺克会意，就跟在福明的后面，向布告板挤去。福明把传单撕下来，搓成一团，塞到上衣兜里。庇罗诺克在他周围绕来绕去，帮助福明驱散人群。当福明伸开胳膊，向人群挥动时，庇罗诺克一刹那就把一张纸贴在他的背上。人群散开了，庇罗诺克也往前跑了。

福明踏着他那沉重的皮靴从市场上走过去。人们丢下自己的买卖，望着他背后的那张纸，上面用粗大的印刷体写着，“你为了一块香肠，为了一口伏特加和一包马哈烟，就把我们的人出卖给德国人。可是你得用你的狗命来抵偿。你小心着吧！”

谁也不来拦住福明，他就背着这个不祥的警告，穿过市场到警察队去了。

谢辽萨和庇罗诺克搭成一对，在市场上从这边走到那边时隐时现。托霞和斯巧巴也不时在铺子和小摊周围打转转。于是人们就在自己的篮子里，空袋里，柜台上或一颗卷心白菜下发现了传单。青年们带着奥列格和万尼亚写的传单初次出马。他们一对一对地出去活动，如果碰上警察就佯装是在谈恋爱。

除了在夜间出去贴传单之外，白天他们还在热闹场所——电影院、市场、职业介绍所附近散发传单。

天蒙蒙亮，刘勃卡就醒来了。她一边哼着小调，一边收拾行李，然后就精心打扮起来，准备上路。

两三天前的一个早上，一辆绿色卡车，在刘勃卡家的小房子旁边停下来。开车的宪兵跳下车子走进屋里。刘勃卡迎着出来，宪兵已经走进餐室在东张西望；他迅速地朝刘勃卡瞥了一眼说：

“汽车要加水，您这儿有水吗？”

“滚你的蛋！懂吗？”刘勃卡对这个穿着德国宪兵服装的俄罗斯司机很反感。可是这个奇怪的开车的宪兵却一动不动，只冷笑了一声说：

“您做事太莽撞了，这对您没什么好处。”他迅速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看背后没有人就急忙说：

“瓦尔瓦拉·纳乌莫芙娜叫我捎个口信，她非常想念您……”

这样一来，刘勃卡就不得不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一趟。是该她行动的时候了。因为她参加了“青年近卫军”，所以她得请示总部同意后才动身。

这天刘勃卡打扮完了，路上搭上一辆德国军官乘坐的小汽车。车子前面坐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副官，后边坐着一个干瘦的上校。“您要我们把您送到哪儿？”

“伏罗希洛夫格勒。”她带着潇洒自然的态度说，很快就抑制住了恐慌的情绪。

她自称是一位实业家的女儿，父亲在哥尔洛夫卡拥有许多矿井，可是苏维埃政权夺去了他的一切。最后这个不幸的人孤独地死在西伯利亚，撇下妻子和四个女儿，她是最小的一个。她自称是演员，要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演出。

就这样，刘勃卡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博得了德国人的欢心和信任。他们畅通无阻地通过了德军检查站，开进了城。她让车子开到一所她认为和矿主女儿身分相称的一幢房子门前下了车。她走进这座陌生的房子里，对既惊奇又惶恐的女主人说："他们让我到你们家来住……我不会妨碍你们吧？"

半小时之后，穿着蓝色皱纱连衣裙和天蓝色鞋子的俄罗斯"女演员"，已经走到铁路横道上，然后顺路上山，去卡缅内——勃罗德。

普罗庆柯的一位联络员带着"女演员"刘勃卡来见普罗庆柯。

刘勃卡首先汇报了克拉斯诺顿六十多位同胞被德寇活埋的惨案。她还补充说，舒尔迦和瓦尔柯就是在这次被活埋的。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然后，刘勃卡又把成立"青年近卫军"组织及其斗争情况作了汇报。普罗庆柯兴奋地坐在桌旁听她讲述。他要求刘勃卡把全体总部委员的个人情况详细地介绍一下。当他听到有个斯塔霍维奇的时候惊奇地追问道：

"他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

"他是游击队派来的，他叫叶夫盖尼。"刘勃卡说。

"对这个小伙子要审查一下！他是在游击队撤退时失踪的。希望他没落在敌人手里。"普罗庆柯强调说。

刘勃卡回来后，向总部汇报了她与州委领导见面的全部情况。总部研究了斯塔霍维奇的问题。斯塔霍维奇在众人的追问下，承认了自己是在敌人包围游击队的情况下逃回来的。但他否认被俘过。他表示要积极地参加对敌斗争。大家认为他临阵脱逃、开小差是个严重错误，决定把他开除出总部，但还把他留在组织里，并让他领导一个小组来考验他。

最后，他们决定处决叛徒福明，并委派杜尔根尼奇和谢辽萨去执行。

这个脑袋狭长、戴着老式帽子和一双像蟒蛇眼似的眼睛、瘦长个子的人，不论是站岗还是去捉人，复仇之神总是日夜跟踪着他，把他的每一件罪行都记录下来。

这夜福明在办事处附近站岗。天下着濛濛细雨，风一阵阵吹得树叶籁籁作响，天空一片漆黑朦胧。福明穿着黑大衣，在林荫道上来回走着，有时停在拱门下面，倚柱而立。当他正这样站着朝黑暗的街里张望时，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死劲搂住他的下巴，勒住他的喉咙，再把他的身子往下一扳，他就倒下了。有人钳住他的鼻子，把一团东西塞到他的嘴里，脸的下半部也被紧紧地扎住，他的手脚都被捆绑起来，仰脸躺在拱门下。

谢辽萨爬上了拱门，在拱门正中拴根粗绳圈。一瞬间，上面有一个人庄严地宣布：

"遵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命令……　　"福明突然感到恐惧，拼命地扭动起来。几个人用力抓住他，把绳圈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脚随即离开了地。杜尔根尼奇把他的脸转向公园街，用别针把一张纸条别在他的胸前，说明他是为什么被处死的。

到九月底，毕尔沃马伊斯基矿山，包括"八家宅"及新一号井区的"青年近卫军"组织已经成为最大的地下青年组织之一。他们自己安装了一台收

音机，自己书写和散发传单，他们还和附近的一些村子取得了联系。他们到处搜集武器。毕尔沃马伊卡的青年人都武装起来了。

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的灵魂是奥列格和杜尔根尼奇，克拉斯诺顿村组织的灵魂是苏姆斯柯依和叶里谢延柯，而毕尔沃马伊卡组织的灵魂则是邬丽亚和阿纳托里。

阿纳托里·波波夫被总部任命为毕尔沃马伊卡的指挥员。他有做共青团工作的经验，为人和善，工作严肃认真，大胆果断，纪律性强，并能团结同志。

邬丽亚·葛洛莫娃是这一切创举的发起人，大部分传单是她写的。这个苗条、修长的姑娘，梳着两条沉甸甸的黑辫子，乌黑的眼睛里一会儿迸射出强烈的光辉，一会儿充满神秘的力量。她是一个与其说是顽皮、不如说是文静；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恬淡，然而又是两者兼具的姑娘。她早在作少先队辆导员的时候就已经在同学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她是个严谨的，内心充满热情的姑娘。她受到周围青年们的好评，他们对她非常崇敬。

妮娜来了，把邬丽亚叫到外边，她说总部委派他们几个去解救在波高烈莱庄林场做工的一批战俘。这是对毕尔沃马伊卡人的第一次考验。邬丽亚、阿纳托里和维克多一块研究了行动计划。第二天黄昏时分，他们就出发了。

他们在顿涅茨河边，波高烈菜庄附近的林子里集合。共来了五个人：阿纳托里、维克多、腊高静、谢毕辽夫和葛拉万。他们都带着枪。维克多还带了一把古老的芬兰刀。葛拉万随身带着钳子、撬棍和螺丝刀。

在南方这个初秋的繁星之夜，青年人躺在河边陡峭的右岸附近，他们要等到半夜哨兵换岗后才能动手。

深夜敌哨换岗后，维克多悄悄地来到岗哨附近潜伏下来，乘哨兵打盹的时候，拔出芬兰刀，结果了他。葛拉万用钳子剪开铁丝网打开一条路。他和阿纳托里奔到营栅门口。葛拉万用撬棍把门环拧断，打开了门。里边的人都惊醒了。

“同志们，你们自由啦！……”阿纳托里激动地喊了起来。

近来爆炸事件经常发生，公路，卡车、小汽车和汽油车动辄就触雷爆炸。突然克烈片卡河上的钢筋水泥桥被炸得飞上了半空；卡缅斯克附近的大桥也倒坍在河里了。

“青年近卫军”的三个战斗小组，在本地区各条大路上和离本州很远的地方活动着。

第一组是由维克多领导的，活动在通往卡缅斯克的大路上，它的主要任务是袭击德国军官乘坐的小汽车；第二组是由俘虏营救出来的红军少尉任尼亚·莫斯柯夫领导的，活动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到李哈雅的各条大路上，任务是袭击汽油车，消灭德国司机和警卫队，把汽油倒在地里；第三组是谢辽萨小组，它到处活动，拦截运载武器、粮食和军服的德国卡车，追捕掉队的德国兵士。总之，“青年近卫军”自成立以来成绩很大，战果辉煌。

奥列格在“青年近卫军”中威信越来越高，影响愈来愈大，这是随着“青年近卫军”活动的展开而逐渐形成的。谁能理解这个十六岁的青年的心里怎么积聚了那么多的智慧。他把前辈最宝贵的经验，书本知识，特别是他的直接领导刘季柯夫对他的教导都融会在一起了，这一切使他聪明过人机智勇敢。

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热爱生活，天真直率。他办事认真，谨慎，严格。

当然他还没脱离孩子气，他那种好胜的脾气，使他总是想亲自去贴传单，烧麦垛，偷武器和伏击敌人。但是为了整体，为了工作他能克制自己。他同比他年龄大的姑娘妮娜产生了友谊。妮娜是个纯朴大胆的姑娘。她不大爱讲话，但富有浪漫气息。

十月革命节快到了，万尼亚和刘勃卡策划了一件了不起的英勇壮举——把红旗插满全城，用这个活动来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十一月六日下午，总部委员在奥列格家集会，他们决定用隆重接受腊箕克·尤尔金入队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晚上他们在柯里亚舅舅的帮助下，用他暗藏的收音机偷偷地收听了斯大林同志的讲话。

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刮着寒风，刘勃卡和谢尔格（他是和刘勃卡一块参加报务训练班的同学）在寒冷而又泥泞的街上走着。他们来到了像门楼又像塔的地方。上面像城堡一样，有着垛口，下面是个小小的办公室和通往矿井的过道。谢尔格和刘勃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到了塔上，把红旗绑到旗杆上。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华丽雅和谢辽萨负责的城中心，是最危险的地方；区执行委贝会大厦和职业介绍所前面都有德国哨兵站岗，第十办事处旁边有“警察”值班，山下是宪兵站岗。但是黑暗和风帮了他们的忙。谢辽萨选中了“疯老爷”的空屋，华丽雅望风，谢辽萨在十五分钟内，就把一切都搞完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看见“疯老爷”的房子上飘扬着一面火红的大旗。一群德国兵和穿着便服的人站在阁楼的梯子附近，仰着脸望着旗子，但谁也不敢爬上去把旗子拔掉。在制高点上，红旗庄严地飘扬着，全城都望得见。

红旗不仅在“疯老爷”的房顶上和伏罗希洛夫学校上空飘扬，红旗还在第十办事处、消费合作社、毕尔沃马伊卡和克拉斯诺顿村的矿井上空飘扬，总之，到处飘扬着红旗。

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看红旗，一些大厦旁边挤得水泄不通。宪兵和“警察”为了驱散人群累得筋疲力尽，但是他们谁也不敢去把红旗取下来，因为每面旗子底下都系有一块白布，上面用黑字写着：“埋有地雷”。

十一月下旬，“青年近卫军”获悉，德国人正在把一大群牲口从罗斯托夫赶到后方去。现在这群牲口已经到了顿涅茨河右岸。这天夜里，三个行动小组一齐出动，由杜尔根尼奇领导。青年们埋伏在河的右岩。当押送牛群的德国警卫队——三十多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后勤兵一踏上桥，他们就开了枪。一瞬间一切都结束了。一千多头牛在河边排着喝水，长达十公里。为了使牲口不落到敌人手里，牧人老大爷建议用自动枪扫射，他们只好用这个办法向牛群扫射。一些牛倒下去了，另外一些受了伤，痛苦地吼叫着向草原奔去。

“青年近卫军”的另外一件赫赫战功是火烧职业介绍所。

自从德国人用登记就业的欺骗手段把第一批城市居民驱赶到德国去之后，人们已经懂得了去职业介绍所登记意味着怎样的后果，就设法逃避登记。所以德国人就到处搜捕抓人。

邬丽亚从在邮局里工作的一位妇女那里得知德国人在城里弄走了将近八百人，他们还拟定了一个一千五百人的黑名单，所以总部决定烧毁职业介绍所，消毁这份名单。

由谢辽萨、刘勃卡和维嘉一起完成的这项任务是“青年近卫军”所执行的最艰巨的任务。

这几天初露寒意，深夜冷得相当厉害。谢辽萨带着一桶汽油和几只燃烧

瓶。每人都身带武器，可是刘勃卡的全部武器却只有一瓶蜂蜜汁和一份《新生活报》。

夜漆黑又寂静，根据哨兵的脚步声，他们才知道已经到了职业介绍所的侧面，想从左侧绕过它，打算从长长的后墙那边进去。为了减少声音，维嘉留在离职业介绍所大约二十公尺的地方，谢辽萨和刘勃卡悄悄地走到窗前。刘勃卡在下面一扇窗子的长方形玻璃上涂满了蜜汁，再贴上报纸。谢辽萨用力压玻璃，使它破裂而不碎落，然后把碎片取下。做这项工作需要有耐性。他们用同样办法处理了第二扇玻璃窗。刘勃卡踩着谢辽萨交叉的双手，一只脚跨过了窗台，进入了室内。谢辽萨随即把汽油桶递给了她。

等了相当时间，刘勃卡才在窗口出现。她从窗台上爬了出来，身上散发出强烈的汽油味。谢辽萨独自站在窗口，一直等到刘勃卡和维嘉走得相当远的时候，他才从怀里摸出一只燃烧瓶，使劲地把它扔进窗洞里。爆燃的火光非常强烈，霎时照得他眼花缭乱，然后他沿着山岗朝铁路支线奔去。

红军在斯大林格勒、顿河以及许多地区获得胜利。红军胜利的消息越多，“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也就开展得越广泛，干得越大胆。

“青年近卫军”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大组织，队员有一百多人，但是他们的活动愈广泛，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撒下的“密网”的网口收得也愈紧。

区委地下党领导人刘季柯夫认为在这个时候应当加倍谨慎，所以他建议“青年近卫军”应当设立一个适当的不引人注意的新联络地点，最好利用高尔基俱乐部这个公共场所，由“青年近卫军”的成员和一般群众共同组织一个名符其实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经由德国占领当局的批准，终于成立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高尔基俱乐部举行了第一次歌舞晚会。

十二月三十日晚，谢辽萨和华丽雅去俱乐部，在路上看见一辆德国卡车停在一幢房子旁边，车上装满了麻袋，但没有警卫，也没有司机，他俩爬上卡车，摸摸麻袋，根据种种情况判断，里面是新年礼品。他们冒险从卡车上扔下几袋，分别塞进附近的院子里和栅栏里。

俱乐部经理莫什柯夫和艺术指导万尼亚建议等散场后，把礼品搬进俱乐部的地下室。

早上，俱乐部负责人斯塔霍维奇同意了万尼亚和莫什柯夫的意见——把一部分礼物，特别是香烟，在当天，即除夕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组织急需用钱。莫什柯夫认识一个在市场上倒卖东西的顽童，于是就通过他把香烟拿去卖。

这一天警察们在失盗地点附近的房子里搜查，没有发现丢失的礼物，所以特别注意是否有人会拿到市场上去卖。结果有一个男孩连香烟一起被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亲手捉住。

经过鞭打和恐吓，那个男孩终于承认香烟是在俱乐部从莫什柯夫那里拿来的。紧接着俱乐部的三个负责人都被捕了。

谢辽萨是第一个知道他们被捕的。他跑来找奥列格。奥列格脸色惨白，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叫华丽雅和妮娜去找邬丽亚和杜尔根尼奇，并叫他们到和总部有联系的那些人的家里去，告诉他们把东西都藏起来，不能藏的就毁掉，同时通知他们的家属，过两小时再听通知。

奥列格去找波里娜、盖奥尔吉叶芙娜，把同志们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她。波里娜不得不在元旦这天再次到刘季柯夫那里去。回来后，她传达了刘季柯

夫的命令——全体总部委员，所有跟总部或跟被捕的人接近的人，都要离开城里，赶紧离开。总部可以留下三个绝对可靠的人继续领导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过讨论，他们决定留下阿纳托里、苏姆斯柯依和邬丽亚三人，其余的全部离开，谁也不许在家里过夜。

当夜奥列格就跟家里人告别了。和他一块儿走的有谢辽萨、华丽雅、妮娜和奥丽雅。他们准备越过战线去投奔红军。

天刚破晓，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党卫队分队长芬庞和两个兵士就来捉奥列格。他们在他家里进行了搜查，逮捕了所有住在里边的人，连维拉外婆和三岁的小外甥也被抓走了。

万尼亚是在黎明时分被捕的。他被推进一间四壁结霜，地板滑腻的，又暗又小的牢房里。他不断地对自己说：“镇静，万尼亚，千万镇静！”

在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接待室里，他们要万尼亚和那个卖烟的男孩对质。万尼亚矢口否认节日礼物和男孩跟他有什么关系。

敌人把万尼亚带到刑讯室，把他的衣服剥光，把他赤条条地扔在血迹斑斑的刑床上。芬庞和索里柯夫斯基各拿一根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抽着他的光身子。万尼亚全身鲜血淋淋，他暗自发誓无论如何不吭一声。

在万尼亚受刑之前不过半小时，莫什柯夫也在这张床上同样受过鞭打。莫什柯夫和万尼亚一样，否认偷窃礼品的事。

远住在郊区的斯塔霍维奇比他们被捕要晚一些。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又是一个意志薄弱者。他在被捕的那一刻，就吓破了胆。他有一种随机应变的才能，一瞬间，就能找出几百个道义上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他要求德国兵让他跟卖烟的男孩对质。转眼间，他就打好了主意，对，把事情变成刑事性的案件。他坦白承认是他们三个人干的，哭诉他们是迫于贫困和饥饿不得已而干的，并保证今后要用诚实的劳动来将功赎罪等等。勃柳克纳马上明白了他们碰到的是个什么货色。在办公室里就开始用毒打来逼他招供。直到把他折磨得供出谢辽萨为止。这个家伙哪里知道，供出谢辽萨之后，反而使他陷入更可怕的灾难的深渊。敌人想抓住他的弱点，来摧毁他的意志。用凉水浇醒了再打，不到天亮他就已经失去了人形。他开始苦苦地哀求。他终于无耻地供出了“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及联络员的名单。不知为什么，他没说出邬丽亚的名字。

敌人首先逮捕了已经离城的总部委员们的父母，后来又逮捕了若拉，斯马巴和谢尔格那些接近总部、现已离城的青年们的父母。接连几天都有人被捕。沃洛佳刚从乡下过年回来，第二天就在工厂被捕了。搜捕持续了好多天，一阵松，一阵紧。

刽子手们不仅要斯塔霍维奇供出“青年近卫军”的全体队员，而且还要他提供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线索。斯塔霍维奇并不知道奥列格是通过什么渠道与地下党联系的。他想起了到奥列格家去得最勤的成年人就算是波里娜·盖奥尔吉叶芙娜了，所以他就把她也供了出来。从波里娜身上的线索，首先联系到刘季柯夫。而被捕的沃洛佳，莫什柯夫又都在他的车间工作。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研究了他的历史材料，再和中央工厂发生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联系起来，事情就比较清楚了。

波里娜在一月五日夜里就被捕了。一月六日早晨，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也在工厂里被捕了，和他们一块被捕的还有十几个人。邬丽亚和阿纳托里是在家里同时被捕的。

在审讯邬丽亚的时候，她说：

“我不准备回答你们的问题，因为我不承认你们有权审问我。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你们也休想听到我的半句话……”于是邬丽亚遭到了和男孩子同样的被残酷拷打的厄运。

刘勃卡是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被捕的。后来把她押回克拉斯诺顿，关在毕尔沃马伊卡女孩子住的牢房里。

这时克拉斯诺顿监狱里已挤满了成年人及“青年近卫军”队员和他们的亲属。因此克拉斯诺顿村的青年们都被关在本村的监狱里。

第一次审讯刘勃卡时，敌人装出一副伪善的嘴脸，没有动硬的。但她很沉着，冷静，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嘻嘻哈哈，装痴、撒娇。敌人暗示她，如果她交出电报密码，对她将是大有好处的，并让她好好考虑考虑。最后，她还是落在芬庞手里。他打她打得相当厉害，她高声叫骂，不仅整个监狱里能听到，就连牢房外的空地上都回荡着她的骂声。

邬丽亚坐在牢房角落里给姑娘们讲故事。刘勃卡躺在屋角里，一种复仇之感在她心中燃烧。

“我们的民族是谁也征服不了的！我们并不怕死……但我们不甘心……我们要跟他们算账！我们还要唱歌！德国人统治三个月，就像呆在坟墓里，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只有呻吟，只有血和泪。

“我们现在偏要唱起来，谁买他们的鬼账！”莎霞叫了一声，把手一挥就唱起来了。

姑娘们都站起来，团团围着莎霞，也随着唱起来。合唱的歌声传遍了整个牢狱。男孩子们也随着她们唱起来。

看守人跑过来阻止他们，他们仍旧高声唱着。过了一会儿勃柳克纳亲自来阻止，但没有人理他，大家继续唱着。接着一群宪兵冲进牢房。男孩子的牢房混战起来，女孩子们被摔倒在靠墙的地方；唯独刘勃卡一个人站在牢房当中，两只手叉着腰，充满仇恨的眼睛旁若无人地朝前瞪着。她像舞蹈似地跺着后鞋跟向勃柳克纳直冲过去。勃柳克纳气呼呼地喊起来：

“啊，你这个瘟丫头！”他用一只手抓住刘勃卡，几乎把她的胳膊拧断，把她拖出牢房。刘勃卡猛地低下头，用牙齿使劲咬住他的手。勃柳克纳怒吼了一声，用拳头，使劲捶刘勃卡的脑袋，但她还是死死咬住不放。

几个宪兵好不容易才把她拉开。兵士们按住她，勃柳克纳和芬庞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抽打她刚结疤的伤口。刘勃卡咬住嘴唇一声不吭。突然，高空中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声音。他们停止了拷打，有人闭上了电灯。

“我们的飞机来了！哼，胆小鬼！孬种！你们的末日到了，败类！”刘勃卡大声嚷着，心里充满了得意之感。

这几天狱里的队员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隐瞒自己的身分，开始跟折磨他们的刽子手进行斗争。他们嘲弄德国人，对他们说粗话，在牢房里唱歌，跳舞；有人去受刑，他们就大声喧闹。所以现在他们所受的磨难也是空前的，简直是人类意识无法想象的磨难。

奥列格他们五人在流离失所的人群中间走着，游荡着。他们虽然离前线很近，但是五个人不可能一块越过战线。后来他们就分手了；奥丽雅和妮娜去投奔亲戚，奥列格打算自己在附近找机会越过战线；谢辽萨和华丽雅则想在一块儿试试。

奥列格几次试着越过战线，但都未成功。他一直惦念城里的青年伙伴，

最后，他说服自己，偷偷溜回城里。

德国人为了减轻负担就把那些作为人质的“青年近卫军”队员的亲属释放了。奥列格在夜里回到家里。正好家里的人才从监狱回来不久。柯里亚舅舅把全城大逮捕的事情告诉了他。一家人商量好由柯里亚当夜把奥列格送到乡下亲戚家里避一避。

他们在荒无人迹的草原上向罗文基走去。当走到一个村旁的小路上，突然碰上了几个敌人，拦住他们的去路，柯里亚和奥列格不约而同地拔腿就跑。奥列格由于疲劳过度，终于力不从心，脚底下一滑就摔倒了。几个德国人扑到他身上，把他的手捆起来。

一个上等兵搜查了奥列格的全身。他剥下奥列格的棉袄，一寸一寸地摸，终于摸到了硬纸做的团证。奥列格蓦地意识到：这下子什么都完了。

第二天，奥列格被押送到罗文基警察局。他独自坐在漆黑的牢房里，心潮起伏。他想念妈妈，想念妮娜，也想到自己多么愚蠢地落入敌人的魔掌。他并不是在考虑前途，他是在总结自己短促的一生：

“我才十六岁，我的生活道路是这样短促……有什么使我害怕？是死亡？是拷打？这些我都能忍受……人生的全部幸福我都没尝过，不过我是幸福的！我幸福，因为我没有像蛆虫那样匍匐爬行，……我在斗争。让我的死亡也像我的一生一样纯洁吧！我可以毫不惭愧地对自己这样说：你死得值得，亲爱的奥列格。……”

第二天，他被带去审讯。在座的宪兵军官都带着好奇和惊讶的神态望着他。有的人好像瞻仰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样。奥列格无法想象“青年近卫军”的名气有多么大，也更想象不出由于斯塔霍维奇的口供和德国人这么久捉不到他，竟使他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了。

敌人要他供出“青年近卫军”的全部活动情况及全体成员和同党。奥列格回答道：

“是我一个人领导青年近卫军，队员按照我的指示去做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负责。如果有公开法庭审问我，我也许讲讲‘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但是我不能向你们这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讲，你们已经是死了的人了。这是我最后的话。”说完，他便垂下了睫毛。

从此他就落入秘密警察手里，开始过着那种惨绝人寰的生活。

刘季柯夫也被押到罗文基的秘密警察机关受野战军司令官的审讯。敌人并没有查明他是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的首脑，但是他们感到这是所有落进他们魔掌的人们中最重要的人物。

谢辽萨和华丽雅由于一起越过战线的尝试失败而分手了。谢辽萨单身越过了战线，投奔了红军。华丽雅一个人走着，终于回到了克拉斯诺顿。谢辽萨在随部队进攻卡缅斯克的一次夜战中受了伤，掉了队。他一个人忍饥挨饿沿着战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着。最后，他也回到了家。可是就在他回家的当夜，由于密探的告发而被捕了。谢辽萨的母亲由于抗拒逮捕儿子也一同被抓走了。

受刑的时候，谢辽萨一声不吭，无论怎么拷打，他都不吭声。尽管受伤的左臂万分疼痛，他的生命力仍然很旺盛。当被投入单人房间后，他马上就敲两边的墙壁，打听左右关押的是什么人。他踮起脚来研究天棚下面的缝隙能否扩大，能否拆掉一块板。他相信，只要能钻出牢房，不管从哪里他都可以逃走。

第二天，敌人让谢辽萨跟维嘉对质，他一直没吭声，维嘉也否认认识他。后来，谢辽萨的母亲被押了进来。刽子手们剥下老人的衣服，把她仍到刑床上，当着儿子的面毒打她。谢辽萨虽然心像刀割一样难受，但仍然不吭一声。芬庞冒火了，抓起一根铁棍，一棍子打断了他的那只好胳膊。谢辽萨脸色变得惨白，额上冒出汗珠。

克拉斯诺顿村的被捕者这时已经转移到这个监狱里。大多数人不能走动。

刘勃卡被提走了。她被送到罗文基，德军野战军司令官克列尔要亲自审问她。

万尼亚摇摇晃晃地站在勃柳克纳而前，他满脸流血，脑袋无力地耷拉着，他抬起头来，在四个星期的沉默之后，第一次开了口：

“怎么样，办不到吧？……你们这些强盗，把荣誉和良心都抛弃了，可是你们办不到，你们没有这个本事！你们要完蛋了！”他说着就大笑起来。

这天傍晚时分，两个德国兵把邬丽亚抬进牢房，她惨白的脸朝后仰着，辫子拖到地上。他们把她扔到墙边。邬丽亚哼了一声，转过身来趴着。她叫李丽亚把上衣卷起来。李丽亚把她的上衣卷上去，吓得她不由得后退了一步，痛哭起来：邬丽亚的背上被刺了一个血淋淋的五角星。

在一个寒冷寂静的夜里，敌人要处死“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们。第一个被抬出来的是没有一丝力气，而且已经丧失理智的斯塔霍维奇，他们一甩就把他扔进卡车。不少人不能走。阿纳托里是被抬出来的，他的一只脚被砍掉了。维克多的一只眼睛被打了出来，由腊高静和谢毕辽夫扶着。沃洛佳被砍掉了右手，他自己走。万尼亚由托里亚和维嘉抬出来。在他们后面，谢辽萨像草茎似的，摇摇晃晃地走着。青年们被装进两辆卡车。前面一辆车上都是姑娘们。邬丽亚、莎霞和李丽亚唱了起来。后面卡车里的小伙子们也唱了起来。他们的歌声在严寒的，凝止不动的空气里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两辆卡车开过左面最后一所房子，上了通向五号井的大路。谢辽萨贴着卡车的后车帮坐着，车子马上就要穿过峡谷，这是逃跑的机会。他想自己要做这件事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但是他前面跪着双手被反绑的柯瓦辽夫。柯瓦辽夫还很有劲。所以手被绑上。谢辽萨用头顶了他一下。柯瓦辽夫转过脸来。

“托尔卡，……马上要过峡谷了，……”谢辽萨低语说，又用头朝旁边点点。柯瓦辽夫斜过眼来看自己肩膀后面被绑着的双手，动了动。谢辽萨把牙齿贴在绑着柯瓦辽夫双手的绳结上，他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累得几次靠在车帮上，额上直冒汗珠。但是他拚命地干，好像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一样。绳结终于被弄开了。柯瓦辽夫仍旧把手放在背后，让两手活动活动。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照旧唱着。

卡车驶下峡谷，前面的一辆已经在爬坡。第二辆卡车吼叫着，车轮打着滑，使劲地开上去。何瓦辽夫一只脚踏上后车帮，纵身一跳，就沿着峡谷奔去，在雪地上踩出一条沟痕。

最初一刹那的惊慌过去了，可是这时卡车已经开出峡谷，柯瓦辽夫也无影无踪了。兵士们怕其他被捕的人纷纷逃散，不敢跳下车去，只好在车上向逃跑的方向乱开了一阵枪。

“他跑了！……他跑了！……”谢辽萨怀着难以形容的强烈狂喜，用尖细的声音喊着。

车子在被炸毁的五号井的井架旁边停下来。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唱起了《国

际歌》。他们被赶到矿井附近的一个上了冻的澡堂里，等候勃柳克纳和市长斯塔庆柯来宣判。宣判完宪兵们就动手把囚犯们穿的好衣服和好鞋子剥下来。

“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们乘这个当儿在互相告别。万尼亚的女朋友克拉娃紧紧地挨着他，不再和他分开。

他们一小批一小批地被扔进探井里。德国人怕几十个人同时被扔进探井不会全部死掉，就又把两辆煤车推了下去。尽管这样，矿井里还是一连几天断断续续地传出被害者的呻吟声。

费里普·彼得罗维奇·刘季柯夫和奥列格·柯舍沃伊，手腕被绑着，站在野战军司令官克列尔面前。克列尔企图逼他们供出不单是本区的，而且是全州的地下组织线索。

刘季柯夫头上的白发被干了的血粘在一块，被撕得破烂不堪的衣服粘连在他那魁梧身躯的伤口上。他的眼神平静而严厉，像平时一样沉着镇定。

奥列格站在那里，他那被打断的胳膊无力地耷拉着。他的脸几乎没有改变，只是两鬓已经发白。他那对深藏在暗色睫毛下的大眼睛带着泰然自若傲视一切的神色。

这一老一少——群众的领导人，威严挺立在野战军司令官的面前，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们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无畏惧，他们的精神是那么伟大而又崇高。

后来他们被分开了。刘季柯夫又被解回克拉斯诺顿的监狱，中央工厂的案件仍旧没有调查完毕。

刘季柯夫、巴腊柯夫和他们的同伴们也遭到了和“青年近卫军”队员们同样的命运：一个个被扔进五号井的探井里。

奥列格于一月三十一日白天在罗文基被枪决。他的尸体和其他在同一天被枪决的人们的尸体一起埋在一个大坑里。

刘勃卡被折磨到二月七日，因为法西斯暴徒们一直不肯死心，他们企图从她那里弄到密电码和发报机，当然，敌人什么也没得到。在枪决之前，刘勃卡给母亲寄了个纸条，上写：“永别了，妈妈，你的女儿刘巴要到地下去了。

刘勃卡被押出去枪决的时候，唱起了她平时最喜欢的一支歌：“在莫斯科广阔的地方……”

押她枪决的党卫队分队长要她跪下来以便对她的后脑勺开枪，但是刘勃卡凛然不屈，她不肯跪下，她正面对着敌人射来的子弹。

杜尔根尼奇在大逮捕时逃脱以后，就越过了顿涅茨河，几天后，他到达了高罗箕希以南的一个偏僻的楚庚卡村。就在这里，他组织了一支名震全州的伊凡·克拉庇文游击队。到二月份，他带领他的游击队加入了红军正规部队，并跟这支部队一起攻过了顿涅茨河，来到了克拉斯诺顿。

刘勃卡牺牲的时候离红军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伏罗希洛夫格勒只有一个星期。二月十五日苏联坦克部队冲进了克拉斯诺顿，苏维埃政权机构紧跟着又回到了这里。

接连好几天，人们悲痛地看着矿工们不断地从五号井的探井里拖出死难的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尸体。

在这几天里，人们还愤怒地揭露了法西斯强盗的另一罪行，于是，公园里被活埋的人们的墓坑被挖掘了。殉难者都直挺挺地站在泥土里。瓦尔柯、

舒尔迦、彼得洛夫的尸体也在这里被发现。另外，还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的尸体。

从五号井的探井里挖掘出来的“青年近卫军”队员和成年人的尸体都安葬在公园里的两座烈士墓里。

参加葬礼的有全体活着的克拉斯诺顿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成员和“青年近卫军”的队员：杜尔根尼奇、华丽雅、若拉、奥丽雅、妮娜、腊箕克等。

生还的人们里面没有谢尔格，他在越过战线时不幸牺牲了。

阿纳托里被一个工人隐藏在新村里。过了几天，他怕连累人家，就去投奔亲戚了。

普罗庆柯一直和他的部队在后方作战。现在他和他的妻子卡佳特意赶来追悼殉难的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们。

在殉难的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近卫军”队员的墓前，他们活着的同伴们宣誓要为战友复仇。在坟上竖起了一块临时的纪念碑——普通的木方尖碑。竖在成年人地下工作者墓前的那块碑上，写着以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为首的一些牺牲者的光辉的名字。在碑的顶端写着斯大林在列宁墓前的誓言：“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在“青年近卫军”队员的方尖碑的四面写着这个组织为祖国牺牲的全体战士的英名：奥列格·柯舍沃伊、伊凡·捷姆奴霍夫、邬丽亚·葛洛莫娃、谢尔盖·邱列宁、刘波芙·谢夫卓娃、阿纳托里·波波夫、尼柯拉·苏姆斯柯依，符拉箕米尔·奥西摩兴……

法捷耶夫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在广阔的卫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艺术地再现了当年“青年近卫军”的英勇斗争生活，歌颂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苏联人民，生动地塑造了“青年近卫军”的英雄群像，讴歌了他们在斗争中迸发出来的绚丽夺目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颂扬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残暴而又虚弱的反动本质。

这部小说结构宏伟庞大，情节曲折、生动、繁杂，人物众多。在结构上自始至终贯串着四条线索：“青年近卫军”、地下党、游击队和红军。这四条线索由于党的领导，战斗的配合，主人公的联系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交织在一个统一的结构中。这四条线索以“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为主，它在全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广阔背景下展开。“青年近卫军”的活动多运用明写、详写的方法，尽情铺陈，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其他线索则常用暗写，略写，简明含蓄，起到主次分层，烘云托月的效果。小说主要体现了在敌后反法西斯斗争中，党所起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至于红军的撤退、战斗、进攻，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游击战争的发展壮大，直到整个国土的解放等等，则是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来处理的。故事的结局是悲壮的，不少布尔什维克及“青年近卫军”队员壮烈地牺牲了，但他们的革命品质升华到了人类道德的高峰，激励读者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为胜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

作者着重刻画了社会主义青年一代的光辉形象。首先是把他们写成综合的集体形象。英雄们从小就受到了共产党、共青团、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薰陶，所以他们的道德品质高尚而纯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热爱共产主义、热爱党和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他们勇敢机智、有宏伟的志愿和崇高的理想，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这些青年忠于爱情和友谊，有广泛的科学知识，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这一切显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开阔

丰富。法捷耶夫写道：“似乎是最难以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求实精神，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特点，就创造了这一代人的独特风貌。”然而这些共同的品质特征，又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每个青年的身上体现出来。每个青年都有别人不可重复的秉性和风格。

奥列格心地纯洁，坚毅果断，早熟而又不失孩子气，头脑清醒，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和高度的组织观念，邬丽亚热情、沉着而稳重，严以律己，对别人要求也很严格，在她身上外在美和内在美高度统一，和谐一致；绰号“教授”和“诗人”的万尼亚是个谦逊、幽默、才华横溢、内心世界异常深邃而丰富的青年人；谢辽萨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勇敢无畏的小伙子；刘勃卡是个机智豪爽，朝气蓬勃，像火焰般轻飘的姑娘，她具有演员的模仿才能和揣测对方心理的特殊本领，她善于巧妙地和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侦察任务。

法捷耶夫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手法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崇高的精神世界。他细致地分析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并且对人物性格加以哲理性的论断，概括地叙述了人物的身世及精神特点，重复强调人物的行为、语言、外貌上的细节特征。通过斗争和生活去揭示人物对人对事的态度……这些手法的运用既突出了人物最优秀的品质，又显示了人物极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性。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是人类最美好，最高尚的新人。他们进行着最现实的残酷斗争，垒筑着与日月同辉的英雄业迹，激励着人们向往美好的明天，创造幸福的未来。法捷耶夫既运用娴熟的现实主义笔法来表现已故的英雄，又以浪漫主义的激情来歌颂一代新人。作者凭借他那鬼斧神工般的艺术手法，赋予《青年近卫军》以浓烈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他把正面人物放在一种高昂、振奋人心的诗境中来描写。不论是庄严的或是轻快的场面，都不仅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真实，生动的浮雕似的立体感，而且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促使人们的感情飞升。作者在刻画敌人时笔调则完全相反，以极大的嫌恶，以尖锐难挡的讽刺方法，深刻剖析敌人的丑恶灵魂，加以无情地鞭挞，或辛辣的嘲讽。

小说中还使用了抒情性插话的艺术手法。作者经常自己走向前台，中断对人物的描写和对事件的叙述而插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又与主人公，与读者交融着，它高飞、回荡、振奋、扩展，大大地强化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

法捷耶夫笔下的自然景色，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他描写的景色都是和事件进程的情节与人物的性格和心情相一致的。作者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高尔基表现新人的传统并运用了古典文学的写作技巧和经验。

法捷耶夫与中国

法捷耶夫的名字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他“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早在三十年代，法捷耶夫的小说和文学论文就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先生非常喜欢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称它为“纪念碑的小说”。他像普罗米修士偷火给人间一样，把《毁灭》由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在一九三〇年创刊的《萌芽》杂志上连载。后来又参照英德两种译本进行了修改，于一九三一年冒着生命危险由自己出资用三闲书屋名义出版了这部小说。鲁迅把《毁灭》的译介看成是教育人民群众和向敌人进行斗争的革命工作；把《毁灭》的出版看成是“一点小小的胜利”。

《毁灭》这部作品对我国读者起过很大的教育作用。我国有很多青年是因为读了《毁灭》等革命书籍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彝族作家李乔就是一例。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年代《毁灭》曾教育了那些坚持游击战争的英雄们。他们从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莫罗兹卡和密契克身上认识到自己应该学的是什么，应该克服的是什么，从而使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能保持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作家肖殷同志在《光辉灿烂的榜样》一文中，前公安部郝若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莱奋生，保尔·柯察金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一文中都以真实动人的事例证明了《毁灭》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毛泽东同志对这部作品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法捷耶夫的另一部长篇名著《青年近卫军》刚一问世，水夫同志就把它翻译过来，并于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了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最喜爱的读物之一。书中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英雄形象，成了我国青年的学习榜样。一九五三年国民党军队攻占福建东山后，立刻就出现了一个和“青年近卫军”一样的“东山少年”地下组织，与敌人展开了斗争。在张志新烈士生前喜爱的文学书籍中就有《青年近卫军》。这部作品在我国和其他优秀作品一样，的确成了一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生活教科书”，读了之后，会帮助他们树立为无产阶级事业而献身的革命人生观。

除了文艺作品外，法捷耶夫的关于文学问题的论文也被介绍到我国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号的《北斗》杂志上发表了冯雪峰同志翻译的《创作方法论》一文。这是我国读者看到的第一篇法捷耶夫的理论文章。后来，法捷耶夫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著作都陆陆续续地被翻译过来。他的论文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法捷耶夫青少年时代是在接近我国黑龙江省的远东地区度过的，并在这一带从事过多年的革命活动，所以他很早就较熟悉中国。他了解中国人民，说：“中国人民的性格有很多与俄罗斯人性格相近的地方，这就是：幽默感，忘我精神，非凡的坚韧、忍耐，喜爱劳动——喜爱始终不倦地顽强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劳动。”他也熟悉和热爱中国文化。一九三四年，他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文化》一文中曾说过，马雅可夫斯基经常像中国戏剧那样运用“假定性”的形式，并且取得了现实主义的成果。他了解中国古代文

化，特别是文学作品，如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一九三二年他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东方委员会中国部，这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法捷耶夫对中国的革命文化更是关心，他说：“我们怀着热爱的心情注视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还记得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还记得鲁迅同他的学生和朋友为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他特别敬重鲁迅，说鲁迅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称他为“短篇小说的能手”、“文字巨匠”，和契诃夫、高尔基并驾齐驱，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和世界文学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对郭沫若、茅盾、丁玲等老一辈作家也非常赞赏，说他们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作家”。

法捷耶夫不仅自己推崇中国的文化，而且积极致力于中苏文化的交流。他说，尽管把中国文学，特别是把中国古典文学译成俄文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也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一九四九年他从中国回国后，就在苏联作家协会里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学小组，自任组长，吸收了许多苏联著名作家、汉学家和翻译家参加。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研究和译介中国文学。

在谈到法捷耶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不能不着重提一下他与鲁迅之间的“文字姻缘”。众所周知，法捷耶夫的《毁灭》是鲁迅翻译的。这件事曾使当时还很年轻的法捷耶夫深受感动。此后多年，他不只一次地表示了对鲁迅的感激之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苏联作家协会在作家之家举行悼念鲁迅的大会。大会主席就是法捷耶夫。他在作了鲁迅生平的报告之后，说道：鲁迅曾将他的《毁灭》译成中文，他引为荣幸，他特别感激鲁迅。一九三七年，上海的鲁迅纪念委员会曾去函聘请法捷耶夫作纪念委员会的委员，法捷耶夫欣然同意，在回信中写道：“纪念鲁迅对于我特别珍贵，因为承蒙他这个中国文学的巨匠翻译了我的不腆之作《毁灭》，使得它能接近了中国的劳动者。”法捷耶夫懂得一些中文，他曾在肖三同志的帮助下向苏联读者译介了鲁迅的一些早期作品，如《阿Q正传》和《药》。一九四九年十月，法捷耶夫说：“……我是稍微懂得一点中国语言结构的人，在中国的诗人肖三帮助之下曾把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字一句地译成俄文，我曾努力在我国的语言文字里寻找那能够表达鲁迅天才的最正确的表现法……鲁迅曾费了珍贵的时间把我年轻时候的作品《毁灭》译成中文，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回答这位世界的文学家……”

鲁迅和法捷耶夫这两位文学大师把对方的作品看成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可贵财富，把互相译介对方的作品看作是对本国人民、对革命的文学事业应尽的义务。他们之间这种感人的文字情谊不仅在中苏文化交流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法捷耶夫始终抱着最大的同情关心着中国革命的每个阶段，“还是在伟大的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关心中国革命。”他说：“我们和你们一块儿感受过革命中的一切不可想象的困难，一块儿为革命的胜利而欢喜。”当中国人民取得对国内外敌人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他更是“高兴得了不得”，为了同我国人民一起欢庆胜利，一九四九年九月底，他率苏联文化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开国大典和进行友好访问。到中国来是法捷耶夫多年的愿望。他为自己愿望的实现而欢欣。当这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著名作家到达哈尔滨时，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愉快，对前来迎接他的老朋友肖三同志说：“多少次和你说过，要到中国来的，现在果然来了。”

法捷耶夫在中国期间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因此他对中国的光辉未来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说：“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政治的胜利，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胜利。”“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在文化方面将要焕然一新，人民革命的胜利将使中国人民列入指示全人类道路的世界最进步的民族之中。

作家的艺术特色

法捷耶夫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篇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早已成为苏联文学的经典性作品，至今仍然那么鲜明动人，有一股永不衰败的魅力。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作者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这样最重要的时代，再现了历史上真实的、战斗的生活画卷。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如莱奋生的原型是共产主义特别支队的支队长彼伏兹涅尔，《青年近卫军》的题材是克拉斯诺顿青年地下组织的反法西斯德国的斗争，通过对这些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写，揭示了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斗争的基本主题，充满了高度的思想性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第二，在揭示作品的基本主题时，作者肯定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法捷耶夫在其全部创作中塑造了许多光辉的共产党员形象——聂烈京、契尔诺科夫、苏尔科夫、楚尔金、刘季柯夫、普罗庆柯等。这些形象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摧毁和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斗争中既是勇敢机智、善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是站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上高瞻远瞩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或革命浪漫主义者。早在内战年代，聂烈京、楚尔金等就已向往着社会主义建设了：勘探矿藏、开发群山、改造河流、探索原子奥秘为人类造福了。正是在这样的共产党人领导下，人民群众才取得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

第三，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法捷耶夫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反对压迫剥削，争取自由解放，作自己生活命运的主人，改善自己的生活，建设更美好的明天和更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要求和行动。作家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人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革命品质，歌颂了他们的美好心灵。《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中的极其普通的矿工伊格纳特·萨因柯平时与革命活动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只是同情革命，但是在同志们要求把炸药藏在他家时他竟同意了这个极其危险的要求。不幸，炸药被搜出，他被捕了。从被捕的那一分钟起，他就知道活不长了。他想到死后两个孩子太小怎么办？妻子是个斜眼，谁能要她？她拖两个小孩可怎么生活？他真是可怜妻子和孩子。当然，只要他供出是谁让他藏炸药的，他就可以获释。但是，他根本没产生过这种要出卖革命同志的想法，他相信，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迫使他泄露秘密，敌人的酷刑没有征服他，他英勇地牺牲了。这就是人民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第四，法捷耶夫真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活中新与旧的斗争和新战胜旧的过程。法捷耶夫的作品的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新与旧的激烈斗争的基础上的，通过斗争，旧的逐渐消亡，新的逐渐成长。这新与旧的斗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革命队伍内部先进与后进两种人物身上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在反映这新与旧的尖锐冲突或斗争时，作家特别注意对立双方的代表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变化和他们的心理感受，力求挖掘出他们各自的行为动机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例如：莫罗兹卡转变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密契克叛变前后的心理变化，“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们同法西斯匪徒英勇斗争的思想动力等等。

第五，作品中充满着浓郁的抒情气氛。作家在描写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和他们的美好品质、高尚情操时，就憩息和陶醉在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之中，于是他那满腔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就通过诗一般的语言自然而然地在他的笔下涌流出来，如在《青年近卫军》中就有很多的抒情章节，特别是那些抒情插话，简直就是赞美歌，散文诗。

法捷耶夫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像一朵艳丽的奇葩永不凋落，这是他坚持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胜利。

\